

# 海口只是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的中心， 还是更大区域的中心

——与施坚雅对话

张继焦\*，钟媛婷\*\*

**摘要**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海口是海南的中心，但是，海口仅是海南的中心吗？还是更大区域的什么中心？本文从三个区域“海口—海南，海口—岭南，海口—东南亚”对话施坚雅，分析如何形成以海口为中心的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以及以海口为次中心的岭南、东南亚城镇及市场体系。自明清以来，官方伞式力量与民间蜂窝力量共同致力城市体系发展，海南城镇体系趋于成熟：府、州、县、镇四级等级结构，多种职能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海口通过下南洋及华侨归国建设等不断突破区域边界，建构国际交易网络，成为岭南区域市场和东南亚地区的次中心。

**关键词** 城镇体系 市场体系 中心 海南海口 施坚雅

## 前言

时隔两年，笔者再次提笔与施坚雅对话。两年前，笔者发表《粤商及其所建立的岭南地区和全国性市场体系——与费正清和施

---

\* 张继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室主任、二级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Email: jjzhang@cass.org.cn

\*\* 钟媛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Email: 1299550636@qq.com

\*\*\*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编号：20VMZ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编号：2019ZDGH01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和所重点创新工程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改革与完善研究”（编号：2022MZSCX006）等阶段性成果。

坚雅的对话》<sup>①</sup>受到学界的认可与鼓舞。在该文文末提到：在整个二元社会结构与岭南地区珠江流域城市体系与市场结构遥相呼应，正是这种结构带动了中华帝国晚期内地多城市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并加强了与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联系。文末指出这部分内容要另起一文加之探讨。2022年笔者到海口调研正有此意，故写下此文加以探讨，望学界不吝惜批评与指正。

最近几年，笔者陆续到访岭南地区的几个城市、几个港口、老商业街实地走访，如海口骑楼和府城古街、广州十三行、北海老街、岭南花都市场；钦州铁山港、北海港、海南港口、湛江古商埠老街区等<sup>②</sup>。在走访海南的时候，笔者了解到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长盛不衰的东方之港，广州可经香港和澳门，直通南洋各国，也可经琼州海峡联系海南岛甚至东南亚各国。自明清以来，海南就与全国乃至东南亚建立联系，作为东南亚的重要节点——海口，在东南亚区域和市场有什么地位呢？在施坚雅分的九个区中，海南属于岭南地区，但海口即使在岭南也并非岭南中心，不由想到海口在岭南甚至更大范围内扮演什么地位？在众多海南研究者都一致认为海口是海南的中心，那么海口究竟是属于海南经济中心、市场中心抑或城镇中心呢？由此，笔者写下此文，探讨海口在岭南地区及东南亚市场中的地位。

## 一、以往研究综述和本文的分析框架

### （一）以往研究综述

#### 1. 关于海南城镇体系和市场体系的研究

研究明清时期的海南城镇体系文章并不算多，著作类有杨卫平的《海南古村古镇解读》，对海南古村落古镇人文生态特征进行探讨时，主要考察了海南古村落的自然构成和人工构成，历史变迁与

<sup>①</sup> 张继焦、吴玥《粤商及其所建立的岭南和全国市场体系：与费正清和施坚雅的对话》，《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

<sup>②</sup> 2021年10月8日—14日再次访问海口骑楼和府城古街，2021年10月15日访广州十三行和岭南花都市场，2018—2021年陆续访问北海老街及北海港，2022年8月22日访问湛江古商埠老街区。

现状特点<sup>①</sup>。明代《正德琼台志》对海南城镇体系的记载：“国朝洪武二年，改为琼、崖、儋、万四州，省琼山，复南建州为定安县，复万安县为万宁州，仍各领属县，隶广西如故。三年，升琼州为府，隶广东。”<sup>②</sup>乾隆《琼州府志》中记载：“琼州，古扬粤也。琼州地居海中，东西距九百七十里，南北距九百七十五里，自徐闻渡海半日可至。琼为都会，居岛之北。儋居西陲，崖居南陲，万居东陲，内包黎峒。万山峻拔，外匝大海，远接岛夷诸国。”<sup>③</sup>“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吉浪之洲，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北接雷州府徐闻县。”<sup>④</sup>民国《琼山县志》记载：“明洪武元年三月，平章廖永忠克广州，七月，守臣陈乾富表献降款，以其地归附。二年，改为琼、崖、儋、万四州省琼山，仍各领属县，隶广西如故。”<sup>⑤</sup>据《方輿志》：“三年，升琼州为府，领州三县十三复琼山，隶广东。元广东统于江西行省，洪武初沿元，七年，改为布政司。十九年，割感恩县属崖州。正统五年，省三州的附郭宜伦、万安、宁远三县。领州三县十。”<sup>⑥</sup>这些方志、著作论证了海口（府城）为海南的中心，为研究海南城镇体系提供一定的史料和依据，但不足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指出海口（府城）是城镇体系的中心，也没有指出是什么样的中心。

系统研究海南市场体系的文章并不多，但不少方志均有记载海南的市场，如明清以来的明代《正德琼台志》对墟市数量的记载：琼山 39 个，澄迈 20 个，临高 14 个，定安 8 个，文昌 9 个，会同 6 个，乐会 3 个，儋州 10 个，昌化 2 个，万州 6 个，陵水 1 个，崖州 3 个，感恩 1 个<sup>⑦</sup>。道光《琼州府志》也有对墟市数量的统计：琼山县 44 个，澄迈县 59 个，定安 36 个，文昌县 43 个，会同 14 个，乐会 12 个，临高 15 个，儋州 33 个，昌化 3 个，万州 27 个，陵水 4 个，崖州 10 个，感恩 3 个<sup>⑧</sup>。《民国琼山县志》也有相应的记载。这

<sup>①</sup> 杨卫平、王辉山、王书磊著《海南古村古镇解读》，南方出版社，2008 年。

<sup>②</sup> 【明】唐胄纂《正德琼台志》，南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0 页。

<sup>③</sup> 【清】萧应植修；陈景垣纂《琼州府志》卷一上，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第 37 页。

<sup>④</sup> 王学萍《黎族藏书·方志部·卷 1·通志府志部分》，海南出版社，2009 年，第 408 页。

<sup>⑤</sup> 朱为潮主修；李熙、王国宪总纂；邓玲、邓红点校《民国琼山县志》，海南出版社，2004 年，第 32 页。

<sup>⑥</sup> 【清】李文烜修；郑文彩纂；【清】张延标编辑《咸丰琼山县志 光绪琼山乡土志》上，海南出版社，2004 年，第 26 页。

<sup>⑦</sup> 【明】唐胄纂《正德琼台志》，国家图书馆，2013 年，第 279-285 页。

<sup>⑧</sup>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第 1 册，海南出版社，2006 年，第 422 页。

些志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市场数量、市场方位、市场的规模,这为我们研究海南市场体系的提供了史料支撑,但是没有划分出海南市场的等级及其中心。按照施坚雅的说法,海口应是什么的中心,它是否为海南城镇体系和市场体系的中心,甚至更大范围的中心,这些史料和著作均未提及。

## 2. 施坚雅的城镇宏观区域理论

施坚雅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国历史的结构》、《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等论著中。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著作中,中国城镇体系分为九个区。施坚雅认为岭南是流域盆地,在岭南流域内,各城市和市场间按照市场等级联系密切程度有所不同,提到广州是岭南区域的中心<sup>①</sup>;而在海南研究中,学者一致认为海口是海南的中心,按照施坚雅的说法,海南应属于岭南区域,但其并没有提出海口在海南中的地位、在岭南流域的定位,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地位。不由让人联系:海口与岭南区域市场的中心广州有什么关系、海口与东南亚国际市场有什么联系?本文于“施坚雅的城镇宏观区域理论”及以往“海南研究”的基础上,就海口的地位展开分析,对话施坚雅。

### (二) 本文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文献梳理,笔者意识到仅了解探究岭南区域的中心城市及中心市场<sup>②</sup>远远不够的,还需“向上”整体研究,因为确定岭南的区域中心及中心市场,并非能概括岭南区域的所有情况,特别是海南城镇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非是自身因素,应与沿着琼州海峡至雷州半岛向北的国内市场乃至向南海方向的东南亚市场有联系。按照施坚雅的区域划分理论,岭南地区是流域盆地,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水系附加陆路形成一条贯通两广、沟通全国的岭南交通

<sup>①</sup> 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335页。

<sup>②</sup> 至于中心市场已经在前期研究加以探讨,详见张继焦、吴玥《粤商及其所建立的岭南地区和全国性市场体系——与费正清和施坚雅的对话》,《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该文指出自上而下的“伞式”支持与自下而上的“蜂窝式”力量双重作用下,粤商建立起岭南乃至全国的市场体系,并促进了各地形成与市场体系相对应的区域与全国城市结构。

运输网络，珠江水系和南海相通，继而可通过各大洋，由珠江水系南下出海则可通达海南岛，海南南渡江的水运加环海南的海运构成海南岛的交通运输网络，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使得岭南地区居民便于从事水上生计，依靠海洋，仰资海洋，又为当地海洋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sup>①</sup>。但海南居民的经济活动区域仅局限于海南吗？其与岭南区域甚至东南亚市场有什么联系？至于广州是岭南区域中心已有文章探讨，且基于前人研究得出海口是海南的城镇和市场体系的中心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除了城镇和市场体系的中心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中心，甚至其会不会是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中心？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海口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领域乃至东南亚区域市场建立联系，在施坚雅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拟从三个区域“海口—海南，海口—岭南，海口—东南亚”看如何形成以海口为中心的海南城镇市场体系以及以海口为次中心的岭南、东南亚城镇及市场体系，在形成过程中，海口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海口是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的中心，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心？由此，笔者假设海南的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断将中心与边缘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联系国内各地商贸，并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中构成了东南亚贸易体系。

## 二、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其在岭南和东南亚的地位

### （一）以海口为中心的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1. 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的发展史

海南，唐虞三代为南服荒徼，秦为越郡外境。汉始置珠崖、儋耳二郡。见《汉书·贾捐之传》：“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sup>②</sup>隋朝，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二级制。唐代在海南先后置“崖州都督府”、“琼州都督府”和“镇州都督府”，均为下都督府。据现存文献记载，至唐末，全岛仍设立一都督府、五州

<sup>①</sup> 叶显恩、周兆晴《孕育出中国海洋文明的珠江三角洲》，《珠江经济》2007年第3期。

<sup>②</sup> 【汉】班固《汉书》第9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0页。

及二十二县。五州皆统于琼州都督府，先后隶属于岭南节度使、岭南东道节度使、清海军节度使。两宋时期，先后在本岛设置众多的统治机构或官职。宋绍定六年（1233），在原来基础上进行拓建，自东门起至海南道，城墙长 800 米，高 2 米，设东、南、西三个城门。现仍存在部分城墙的宋南宁军城址（即今儋州市中和镇），当时已有“数百家之聚”，估计不下二千人口。此时的州县治所是人口集中的聚落，而且已成为了地经济中心，不但当地人在这里集市贸易，甚至已影响到周围黎族地区。当时被贬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在诗中写道：“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sup>①</sup>黎人一早就背着木材进城来交易，从来没看到过他这样的装束，还笑他。当地黎族经常“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圩市……日将晚或吹牛角为声，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sup>②</sup>。元沿宋置。明清时期，海南的城镇和市场体系日臻成熟。明朝，先后在海南岛设立众多的统治和管理机构，属于行政机构，有一府（琼州府），三州（儋、万、崖），十三县（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会同、乐会、定安、宜伦、昌化、感恩、万宁、陵水、宁远）和诸土司；属于治安机构，有巡检司二十八所；属于军事机构，有海南卫、琼崖参将府等。清代地方行政区划，前期大致分为总督辖区，省，府（州、厅），县四级，后期大致分为总督辖区，省，道，府（州、厅），县五级<sup>③</sup>。建置地域不断“扩大和深入”<sup>④</sup>，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的发展是随着中央建置设所的深入而形成的，一般来说，治所所在之地，则是中心城市和中心市场所在之地。即海南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由政府的伞式力量推动所致的。

## 2. 海口在海南城镇和市场体系中的等级和功能

从结构—功能来看，汉代的海南城镇体系可以简单地说已经形成郡—县两级等级结构，但并未形成真正的海南城镇体系，海南城镇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代，这时候呈现府—州—县三级等级结构。最初海南的城镇职能主要用于防御和政治功能，由于海南岛远离中央政府，经常发生黎汉械斗。为加强对海南岛的统治而设置郡

<sup>①</sup>【宋】苏轼原著；【清】王时宇重校；郑行顺点校《琼崖文库·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sup>②</sup>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sup>③</sup>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363页。

<sup>④</sup>杨卫平、王辉山、王书磊著《海南古村古镇解读》，第191页。

所，而将海南岛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如原儋耳郡，据考郡治在今儋州市境内的三都镇旧州坡，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崖城镇自唐朝以来就作为州城，设在宁远河口现在的位置，一直以来这里呈现了一幅繁华景象。海南城镇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央在海南设置的治所，从儋耳郡、珠崖郡二郡的位置可以看出，这些治所选址都较为靠近海边，或河流出海口处，位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点。唐朝以前，海南岛建置并不固定，因而治所也不十分固定。这些城镇发展上百年以来，有的建置存在的时间很短，不久就撤销了，而其治所，有的也很快随之而湮灭，有的却发展成为财丁两旺的古镇一直延续至今天。这些治所的设立加速城镇体系的萌芽，但最初的城镇职能只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所需，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城镇。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划分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此外，还有节镇、镇、砦（寨）等。北宋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至此，海南岛开始归宋朝统治。到了元代，在建置上基本与宋代相同，治所城址也基本没有改变，大致分为行省、路、府、州（军）、县五级。此外，还有在行省和路府之间设置的道，以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地区设置的安抚司和招讨司等机构。

明代地方行政区划，前期大致分为布政司、府、州、县四级，明朝先后在海南岛设立众多的统治和管理机构，属于行政机构；有一府（琼州府），三州（儋、万、崖），十三县（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会同、乐会、定安、宜伦、昌化、感恩、万宁、陵水、宁远）和诸土司；属于治安机构，有巡检司二十八所；属于军事机构，有海南卫、琼崖参将府等。清代海南岛仍属广东省。明清以来，海南城镇体系形成府、州、县、镇四级等级结构，这一时期，海南城镇体系进一步成熟。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区域完善。海南城镇的建设最开始的功能是出于防御需要。《现代汉语词典》中，“镇”的概念是：“镇守，指军队驻扎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曾昭璇在其《人类地理学概论》中这样描述：“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人类战争产物，在古代战争中，城是最有防御力的建筑物。”<sup>①</sup>明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因反击倭寇，官兵驻防琼岛，开设海南分司，建立军事治所。明代的海南卫、琼崖参将府，清代的琼州镇等军事机构，都设在城池内。随着军事驻所的设立，越来越多平

<sup>①</sup> 曾昭璇等著《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民迁移至此，这就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明朝时城镇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批人口涌向城镇，如明代的海口浦，已是“帆樯之众，森如立竹”<sup>①</sup>。到清代雍正年间，“海口城商贾络绎，烟火稠密”<sup>②</sup>，当时海口浦经济繁荣可见一斑。明代海南的手工业有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带动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明清以来，海南文化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兴盛一时，结束了作为流放之地的局面。据《琼山县志》记载：“由唐迄宋，人文蔚起，至明为尤盛。人娴礼义之教，士多邹鲁之风。”<sup>③</sup>由此可见，明清以来，在军事驻所的建立及平民迁此的情况下，官方伞式力量与民间蜂窝力量共同致力城市体系发展，海南城镇体系趋于成熟：府、州、县、镇四级等级结构，多种职能协调发展。城镇的功能也由一开始的防御需要转变政治经济文化等协调发展的功能。

中国古代的市场等级与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等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分析明清时期琼州的市场等级结构时，也可根据古代琼州市场的分布与规律进行此种类型的划分。尽管历朝历代有所不同的琼州古代行政等级区划，在明清时期所形成的府、州、县、乡、里、都、图的行政等级划分是较为稳定的一种划分方式。在这种行政区划下，府、州、县、乡各级行政体制所在地就是其政治中心，在中国社会，通常政治中心是与经济中心依附在一起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相互巩固了地位。据此，可以将琼州的市场体系划分为三级：以琼州府为中心的市场、以州县为中心的市场、以乡镇为中心的市场。

以府为中心的市场在行政等级上对应的是琼州府一级，其覆盖范围与琼州府在行政体系上的范围一致，涵盖整个琼州府所辖地区，因府城地区是琼州府的中心，因此府城也就成为整个琼州的市场中心。在明清两朝，琼州府的府级驻所位于琼山县的府城地区，其市场的所在地与其在同一地方，例如，在明朝时对应的就是琼山县的东门市、府后市、北门市；在清朝时对应的是琼山县的西墟市与东门市。以州、县为中心的市场作为第二级市场，其前提条件是在州、县作为海南的二级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在这种前提下，明清时期恰好能满足这种条件，成为理想的模型。在明清时期，以州、县为中心的二级市场，则是在儋州、崖州、万州州城以及相应的区

<sup>①</sup> 杨卫平、王辉山、王书磊著《海南古村古镇解读》，第195页。

<sup>②</sup> 邹鲁修《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sup>③</sup> 朱为潮、徐淦等主修《民国琼山县志》第1册，第55页。



划下县城内的一些市场，其地理范围覆盖各市场所在的州或县。以乡镇为中心的市场是琼州市场体系中的第三级市场，按照明代唐胄《正德琼台志》所记载的墟市来说，乡镇一级的市场是各州县除在州县城内的市场，这些市场在其所记载的墟市中必然属于大集市<sup>①</sup>。按照清代《道光琼州府志》记载，这类市场是位于除各州县城外的墟市即位于各乡、里、都、图的市场<sup>②</sup>。此外，在这三级市场以外还会形成以村庄为中心的市场，但是这类市场通常是零散的，规模较小，且基本与上述的三级市场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仅用来满足个别交易，交易物品简单，因此难以在古代琼州的市场体系中占据相应的等级层次。

在社会学研究中，结构与功能是两个并存的方面，结构的形成必然伴随着功能的产生，古代琼州市场结构的形成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功能。古代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决定了市场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市场所发挥的功能也在逐步完善。针对市场的功能，下面将从交换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功能进行具体的阐释。

以府城为中心一级市场府城兼具交换、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多种功能。其功能相对以州为中心的二级市场更加齐全，而三类市场则是交换功能较为凸显，其他社会功能及文化功能较弱。如在我们实地考察中的培龙农贸市场，现位于海口府城旧城墙附近，是一处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市场。历史上，该处市场的存在为府城人民提供着生活必需品的交易，维系着数百年来府城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又如根据民国《琼山县志》记载：“灵山新市，在遵都东堡，民国元年七排同建，因近灵山庙，故名。”<sup>③</sup>而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发现集市通常与庙宇、戏台结合在一块或是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的，这也能够说明市场与这些娱乐性的项目是相关联的，体现其文化娱乐功能。由此可见，海南市场体系是以海口府城为中心的一级市场，兼具交换、经济、社会功能，其他等级市场功能相对没有那么完善。

<sup>①</sup>【明】唐胄纂编《正德琼台志下》，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

<sup>②</sup>【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第1册，第409页。

<sup>③</sup>朱为潮、徐淦等主修《民国琼山县志》第1册，第307页。

## (二) 明清以来, 海口成为岭南区域市场的次中心

### 1. 早期移民为海口的发展提供劳动力

海南城镇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唐代的移民中,除了军士及其家属还有大量的商人与手工业者,波斯等地的商人与海南的联系往来也更为频繁,海南生产的一些手工业制品还销往广东等地,这有力推动了海南当时的商业与市场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在南海航线上的对外贸易活动日趋频繁,中央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经营管辖不断增强,海上交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信仰交汇,呈现出海纳百川的文化盛景<sup>①</sup>。宋代时,大陆向海南移民更为频繁,特别是随着大量贬官的到来,海南的经济文化均得到快速发展,当时的州、县治所的市场交易频繁,且州县外的墟市也逐渐发展起来。由于宋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一些沿海港口开始出现墟市,经营各类舶来商品与提供客商服务。元朝时,由于中原战乱,大量的中原人进入海南避乱,海南的商业持续发展,墟市在海南已经十分普遍,特别是沿海地区,港口热闹非凡。这些移民充分发挥其蜂窝式力量构建自身关系,其在海南立足的同时促进海南市场的产生及其发展。此外,宗族力量的崛起也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和财力支撑,如我们调研所知:新坡镇古渡口处的墟市,摊位一侧为当地大姓宗族所有,经营日用品,辐射5公里左右的村庄。再如东堡墟,宋朝时,蔡姓始祖入村,明朝时,蔡、吴两大家族曾因争夺墟市管理权而发生争斗。

明代,随着大量城池的构建,各州县的城池已经基本完备,城池的完备意味着城中市场有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例如,现今府城的马鞍街与绣衣坊其名称就来源于明代时期琼州府的商业街道。据《海南古村古镇解读》一书,明中叶以前,海南较大的圩市有123处,万历末年为179处。清代,海南人口不断增长,商业不断发展,至清朝中叶,海南岛的圩市为310处,圩市分布密度在6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据王兴瑞统计:“自顺治元年至民国二十四年的三百年间,海南岛存在的圩市共有五百九十一处……又各州县圩市数量多寡参差不齐,其中以琼山县为最多,其数计一百零一,儋州次之,澄迈次之,文昌、临高、定安、昌化、万州、崖州、乐会、会

<sup>①</sup> 资料来源:2021年10月8日于海南省博物馆收集。

同、陵水以次再次之，感恩最少，仅五市。明清以来，官方力量构建城池，城市逐渐稳定下来，为市场经营提供了稳定的场所。”<sup>①</sup>

## 2. 海上丝绸之路联结内地市场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中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这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sup>②</sup>。由此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sup>③</sup>。据载，1370年（洪武三年），琼州府就随驿设立铺舍邮亭，交通驿递可谓较前畅达。明代海南贸易有所发展。海口港就是当时海南和大陆联系的主要港口，呈现“云帆樯之聚，森如竹立”的繁华景象。白沙古渡、烈楼私渡、澄迈石蟆港、临高马袅港、文昌清澜港和铺前港、乐会博鳌港、儋州大村港和新昌港、陵水水口港、感恩北黎港、崖州临川港、万州乌场港等港口是海南岛内外交通贸易港口。此外，据记载海南岛还开辟了一些新港，如望楼港（今乐东境内）、毕潭港（今三亚市境内），桐栖港（陵水县境内）等<sup>④</sup>。随着港口的开辟，海南与雷州半岛联系日益密切，海口港、白沙古渡、烈楼私渡等港口常有番船停泊，每日都有船至徐闻；自汉军登陆烈楼至唐朝近千年的历史中，古烈楼渡口一直是大陆进入海南的主要港口之一，是广东、广西、越南商贸进入海口的通道。在陆路交通方面，元代就设立了烈楼驿。自18世纪末至解放前夕，长流地区先后修建了长流至海口的石板路、五里路和海丰路等。当时海南岛与大陆的联系，除了由海路到达大陆沿海各港口外，主要是经徐闻往国内各地。在岛内，各州县之间既有道路、海路相通，又有驿递相通。如海南的耕牛主要靠广东雷州、化州等地运入。至明代耕牛再无需输入。在万州，可见到“牛羊蔽野”<sup>⑤</sup>的景象；在黎峒“牛羊被野，无冒领者田”。那时，广东“肇庆、新兴客反岁货牛于琼”<sup>⑥</sup>，明太祖还曾经派人到海南来买牛。清朝政府开放海禁后，

<sup>①</sup> 王兴瑞《海南岛的圩市及其商业》，王春煜、庞业明编著《王兴瑞学术论文选》，长征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sup>②</sup> 【宋】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751页。

<sup>③</sup> 钟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与衰》，《珠江水运》2015年第10期。

<sup>④</sup> 黎雄峰等著《海南经济史》，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

<sup>⑤</sup> 黎雄峰等著《海南经济史》，第165页。

<sup>⑥</sup> 林日举、黄育琴、李琼兴著《海南民族概论》，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海南的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至雍正年间，海口“商贾络绎，烟火稠密”<sup>①</sup>，已发展成为广东省内中等规模的商业城市，各州县的墟市比明代增多<sup>②</sup>。由此可见，明清以来，海南已经与岭南区域有很强的联系，继广州后成为岭南的次中心。

### （三）海口在东南亚城镇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 1. 突破岭南区域的“界”，下南洋与东南亚建立联系

早在唐代，海南岛已是南海中西航线之要冲，海南人真正意义上的出洋历史，应是从唐代开始的。到宋代，海南四郡凡十一县“地多荒田，所种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故俗以贸香为业。”<sup>③</sup>“世皆云二广出香，然广东香乃自舶上来，广右香产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胜。”<sup>④</sup>“移居南洋的海南人乃以文昌、琼山、乐会、琼东四县为多。”<sup>⑤</sup>这时琼山、临高、文昌、乐会等贸易港设立市舶司，征收科钱。“琼州白沙律，蕃舶所聚之地，其港自海岸屈曲，不通大舟，而大舟泊海岸。”<sup>⑥</sup>当时在海南从事对外贸易的主要是琼山、文昌、万宁一带的居民。海上贸易的兴盛，促使一部分从事这一活动的海南人“住番”久滞不归而成为华侨<sup>⑦</sup>。海南的槟榔也是当时畅销商品之一。“槟榔产自诸番国及海南四州，交趾亦有之。三佛齐取其汁为酒，商舶兴贩，泉广税务岁收万缗，惟海南最多。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sup>⑧</sup>在生产水平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古代，海南必须依靠从外部输入，才能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因此，向海南输入粮食就成为古代海南贸易中的一重要的内容。

---

<sup>①</sup> 郑力乔、高泽强编著《海南民族历史文化暨黎文创制 60 周年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 年，第 172 页。

<sup>②</sup> 黄业春《明清台湾、琼州与大陆的贸易比较》，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第 14 页。

<sup>③</sup> 【宋】赵汝适《诸番志·海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221 页。

<sup>④</sup> 陈铭枢总纂《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 年，第 79-80 页、第 277 页、第 468 页。

<sup>⑤</sup> 吴华《星洲琼籍人士之今与昔》，《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 年，第 265-270 页。

<sup>⑥</sup> 【宋】王象之《輿地纪胜》卷一二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

<sup>⑦</sup> 唐若玲《东南亚琼属华侨华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 页。

<sup>⑧</sup> 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49 页。

海南最早开辟的航线之一是“由海口及文昌之铺前港，取道海峡往西，再南下走西贡、曼谷与星洲等处。”<sup>①</sup>“从 1695 年冬开始，两艘帆船从琼山前往泰国，到 1735 年，发展到 73 艘，常年川走于东南亚各国之间。”<sup>②</sup>“除货物外，每船附载乘客廿余人至百人。顺风时，数日可抵西贡，12 日可抵星洲，半月可抵曼谷。”<sup>③</sup>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已有海南人到暹罗、安南和马六甲谋生。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记载，19 世纪初，每年约有 100 艘帆船从海南出发至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等国从事贸易<sup>④</sup>。据《琼海县志》载：“境内草塘一带渔民，常运载西沙、南沙群岛捕捞的海鲜品和贝壳岛南洋销售，有少数人随船散居于东南亚谋生。”<sup>⑤</sup>“考我琼同乡南来侨居，在新加坡开埠前 1819 年。其当时乃一未僻之渔村，人烟稀少，同乡居此者亦不多，且散居乡村隅角，而无组织。”<sup>⑥</sup>由此可见在 1819 年前，来新加坡谋生者并不多，其谋生者零星散居，无组织，尚未形成一股蜂窝力量。据南洋著名考古学家韩槐准考证，在道光元年（1821），就有帆船自海南运载陶瓷器、铺地之砖、雨伞、鞋、纸、神香、干果及药材等到新加坡销售<sup>⑦</sup>。1823 年，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成立琼府会馆，是海外最早的海南地缘组织。自 1823 年后，海南人开始成立会馆为在海外立足根基提供基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方列强开始大肆在中国贩卖劳工。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将海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自此开启了琼岛人民出洋打工的热潮。咸丰九年（1859），允许人民“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sup>⑧</sup>。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sup>⑨</sup>从此华工出洋合法化。1866 年，

<sup>①</sup> 苏云峰《东南亚琼侨移民史》，《海南历史论文集》，海南出版社，2002 年，第 196 页。

<sup>②</sup> 潘干《琼山县最早洋帆船的兴衰史》，《琼山文史资料》1980 年第 5 期，第 10 页。

<sup>③</sup> 唐若玲《东南亚琼属华侨华人》，第 12 页。

<sup>④</sup> 候莉《从商业文化看海南南洋风格商业街》，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年，第 5 页。

<sup>⑤</sup> 王幛华主编《琼海市华侨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年，第 4 页。

<sup>⑥</sup> 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史略》，《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 年，第 101 页。

<sup>⑦</sup> 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琼州会馆联合会报》1948 年第 1 卷第 1 期。

<sup>⑧</sup>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汇编》（第 2 辑），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79 页。

<sup>⑨</sup> 肖宪著《海上丝路的千年兴衰》，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 年，第 335 页

曼谷至海口直达客轮通航，大批海南人进入泰国。1876年，海口正式开埠设立海关。于是，在国内解除海禁，东南亚缺乏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大量为生活所迫的海南人纷纷南下，到南洋各地出卖苦力，以求生计。据统计，从1876年至1908年，出洋的琼侨总人数超过45万人次，平均每年有1万余人次出洋。而民国时期，琼岛远游之风益盛，其中文昌人居多。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殖民势力侵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丰富的锡矿和经济作物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劳动力的使用出现巨大的缺口。这时候，华工引入就尤为重要。

由此可见，早在唐代，海南已经和东南亚建立联系，到了宋代，随着各贸易港的建立，已有不少国外的船只停留海南港口，至明清以来，特别是海口被强行开放为通商口岸后，随着大量海南人下南洋谋生，海南与东南亚建立货物和人员的联系，海南人出洋至越南、泰国及新加坡等国家经商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南洋社会逐渐留下海南人的生活轨迹，琼侨社会逐步形成，促进东南亚的发展。由此开辟的东南亚区域市场，已经突破原有施坚雅所说的岭南区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为东南亚区域市场提供货物和人力支持。许多海南人在经商贸易过程中，留居南洋，成为华侨，成为海口联结东南亚的市场的的主力军。对于侨居国而言，小商小贩是其经济活动不可缺的组成部分。一大批走乡串户的挑货郎的存在，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来说，显然是有积极的意义。大批小商店、小餐馆等服务行业的存在，对于繁荣当地社会经济、方便民众生活，也是功不可没的。新加坡是一个以商业繁荣著称的地方，众所周知，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是执东南亚牛耳的，新加坡的咖啡店也多为海南人所开。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在新加坡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实，除了咖啡店外，海南人在其他行业也有所作为，只是影响不如咖啡店那样集中和著名罢了。在越南，阮氏王朝对华侨按籍贯、语言分帮管理。七府五帮由此产生<sup>①</sup>。在他们的努力下，充分发挥民间蜂窝力量联结东南亚，使得人流和货流得到快速流动，突破施坚雅的区域联系，人们对价廉物美商品的追求，促使海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沟通界邻地区的不同商品，分属不同的价格平衡点所决定的不同区域，从而形成复杂的并且是相对固定的市场范围。海口日益成为东南亚市场仅次于广州的次中心。并非施坚雅所说的区域内联系密切，区域与区域间的联系并不密切。海南华

<sup>①</sup> 唐若玲《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考察》，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侨构建起海口与东南亚的联系，促成国际市场已经形成，同时也为海南岛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大量海南人出洋经商，给家乡汇回大批侨汇，“本岛人士往南洋经商者年均有千万之汇人”<sup>①</sup>。

### 3. 侨商构建东南亚贸易网

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是海南侨批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南洋，海南华侨人口的急剧增长促进了当地侨批业的迅速发展。1940年，日本占领南洋之前，东南亚地区的海南批信局从最初的2家发展为40家，如恒裕兴、人信壮合记、锦和号、锦泰隆、德和昌合记、琼宝通、联合公司等。至此，东南亚地区的海南侨批业发展达到顶峰。而在海南岛内，民国初年至1939年日本攻占海南岛之前，侨批局数量也快速增长，侨批业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民国时期从事银行工作的程茂材在其文章中记录：1928年至1931年间，海口有平民栈、益日隆、泰原、中民、阜成丰、线泰、实安泰、信安、泰兴、信成、琼源通等23家侨批局。此外，侨批局还在各个乡镇发展了一些营业点——驳批店。1932年，文昌、琼海、琼山、那大等地都已设驳批店，文昌、琼海侨乡尤为发达，各有40余家之多。至20世纪30年代末，海口的侨批局发展到55家，文昌的文城有11家，琼海的嘉积有10家，这是海南岛侨批业历史上批局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侨批业者建立了以乡缘为基础的行业工会就会发挥其组织力量，联系同宗同乡促进侨批业的发展。海南及东南亚侨批业的发展得益于同宗同乡的蜂窝的构建<sup>②</sup>。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

晚清时期，海口是当时全国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在中外商人往来合作与交流中，一些在南洋谋生的人开始回乡投资建设，他们将各地的建筑风格和样式带到海口。海口骑楼街区是随着海运贸易和商埠文化的发展而兴起，早期海口骑楼建筑大多数是南洋华侨个人投资修建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城市中占到一个好的地段用于安家，同时其沿街的铺面又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各家各户大多独立经营，以零售和批发小商品为主的商业形态，个体经济相对于私营经济的比重要一些。据史料记载自1897年之后，海口的个体商业逐渐

<sup>①</sup> 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三联书店，1998年，第145页。

<sup>②</sup> 邢寒冬《海南岛侨批业发展概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93-99页。

发展。到了 1919 年，海口的个体商店已达 400 余间。1923 年，海口总商会向政府批准发执照的个体商业就有：永泰和、邱厚生、梁安记、云旭记等数十家店铺。到 1932 年，海口的个体商业涉及 35 个行业，572 家商店。

表 1：民国时期（1932 年）海口主要商业门类及数量

类别	商店数	类别	商店数
匹头杂货店	40	海味店	39
洋纱面粉店	39	旅店	24
牛栏	12	中西药店	38
汇兑找换店	24	生猪栏	34
米谷店	65	茶楼酒店	12
纸料店	12	瓦瓷店	8
书籍印刷	23	糖果店	10
牛肉行	19	香港庄	10
鞋履店	15	代理船务	4
五金店	25	戏园	3
九八行	24	织造业	20
油漆箱店	10	白通帽店	5
木料店	13	染坊	3
丝店	14	槟榔店	15
照相馆	12	花砖店	1
饼干厂	12	肥皂店	3
冰厂	1	椰雕店	5
家具店	15		

民国时期，在海南岛传统手工业遭受严重冲击，百业萧条的时候，海南主要城市却显现出商业的繁荣，城市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华侨的努力。海南岛的近代城市，尤



其是海口的发展与华侨的汇款支持是分不开的。例如文昌到南洋的谋生者，每年汇款金额达到四五百万元，其经由海口转送，本岛的钱庄几乎都集中在海口市。海口作为海南岛的金融中心，对海南岛的华侨汇款的传递起到了枢纽作用。这些汇款，一方面作为消费型资金，对海南岛的经济和金融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侨汇在传递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投资型资本，促进了当地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繁荣。资金的流动和进出华侨人数的增多，使得海口开始从一个传统的军事型要塞向近代商业型都是转变。据《琼崖事业调查团工商调查报告》统计：民国十九年（1930）海口市内的会员商铺有 323 家，其中旅店业、酒店餐饮业合计 30 家，占商家总数的 9.28%。在 1934-1935 年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11.28%。服务业的发达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sup>①</sup>。为了迎合商业发展的需求，城市建设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除了修建公共建筑外，当时很多华侨选择在海口最繁华的地段投资兴建商住两用型的骑楼建筑，这一方面满足了商业发展的需求，也为自己落叶归根的时候建立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总体而言，海南的社会发展在广东省来说（1988 年建省前，海南一直属广东管辖），是相对滞后的。但是由于华侨的缘故，海南的交通运输业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呈现率先发展的态势。海南最早的琼海汽车公司，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琼侨陈华农等人投资于 1918 年成立的。此后，出现了以海口为中心，辐射文昌、琼山等地的十余条公路以及相应的行车公司，多数为琼侨投资兴建。在施坚雅的区域理论中，并没有指明海口是什么样的中心，由上述材料可证，海口是海南的商业、金融及交通中心，此文在此补其不足。总之，侨商成为联结海口与东南亚的桥梁，构建东南亚贸易网络。在施坚雅的区域理论中，“界邻”地区被视为山高路远、与中心地相对的边缘地带，是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最低端，是中心地、市场、城市的吸附地区而已，其地位显得无足轻重。根据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海南被海南包围，应属于中心相对的边缘地区，然而，华侨的活跃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海南与东南亚市场联结起来，海南与岭南甚至东南亚成为一个市场区，市场区之间的边缘地带——也就是施坚雅的经济区界——反而颇像施坚雅理论中连接基层市场的流动小贩。即华侨通过

<sup>①</sup> 广东省建设厅编辑股编《琼崖事业调查团工商调查报告》，广东省建设厅编辑股，1932 年。

海上丝绸之路，突破经济区的联系，建立起海口-岭南区域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一整片市场区。

## 结语

对于海口而言，早在成为通商口岸之前，海口已经是连接琼州与内陆的重要点。明代的水巷口就是琼州府的官渡和繁荣的码头。后来，海口码头虽几经变迁，但离当时的海口所城都都不算太远。到民国时期，码头迁至今天长提路边上的海口海关一代。由于受到码头的影响，沿岸的商业一直较为繁荣。资金的雄厚及南洋文化的影响，促使了当时海口的传统民居向骑楼建筑的转变。海口周边水运发展，通过琼州海峡内联广州、雷州半岛等地，通过海运下南洋，直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随着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商贸节点的沟通，海南的市场规模和范围逐渐扩大，在海口府城的带动下兴起，构成一张完整的市场交易网络，成为岭南及东南亚的次中心，这些次中心地区又继续向边缘地区传播，形成一个个专业性的市场街区和商城。在清政府“伞式”力量和民间“蜂窝”力量的支持下，勾勒出以海口府城为中心的海南各商镇经济发展、互联互通的空间演变历程。

显然，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不足以解释岭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海口成为岭南及东南亚次中心市场是官方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施坚雅的研究过分强调九大区域的独特属性及其发展周期，忽视了各区域间的互动联系。与施坚雅显著不同的是，我们通过海口城镇体系及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突出了各个区域间的动态联系，不同区域之间并非是孤立的，各区域体系的形成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这与强调区域界分的施坚雅相比，显然更符合中国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王康玮

校    对：魏伽珈

# **Haikou is only the center of Hainan's town and market system, but also the center of a larger region**

**Dialogue with G.WilliamSkinner**

**Zhang JiJiao & Zhong YuanT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many scholars have believed that Haikou is the center of Hainan. However, is Haikou merely the center of Hainan, or does it serve as the center for a larger region? This essay discusses G.WilliamSkinner from three regional perspectives: “Haikou-Hainan, Haikou-Lingnan, and Haikou-Southeast Asia”, and it analyses how the urban and market systems in Hainan are centred around Haikou and how Lingnan and Southeast Asian urban and market systems revolve around Haikou as a secondary centr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oth official and grassroots forces have joint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system, and Hainan's urban system has become mature: a four-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prefecture, county and tow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Haikou has continuously broken through regional boundaries and built 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network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anyang and the return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has become a sub-center of the Lingnan regional market and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Urban system, market system, centre, Haikou Hainan, G.WilliamSkinner

# 论“南侨诗宗”丘菽园改还本姓 的内在意涵

——以“丘”和“邱”字为例

梁金群\*

**摘要** 邱姓之起源，一般认为是由丘姓避讳而来。本文从文字学视角切入，通过解读“丘”和“邱”二汉字之起源和形义演变，考察中国古代避讳学及避孔子名讳事件对于“丘”、“邱”二字之影响。进一步配合“南侨诗宗”丘菽园生平、著作及思想脉络，研析西化影响下之新加坡现代性语境、近现代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影响，梳理丘氏于民国初年改还本姓之内在意涵。基于先生民国后的档案署名及生前自筑生坟墓志铭皆已改还“丘”姓，可资证明其意愿，故笔者呼吁学界予以尊重，应统一以“丘”字作为菽园之姓氏。

**关键词** 丘菽园 邱菽园 新思想 避名讳 姓氏

## 前言

丘菽园<sup>①</sup>（1874-1941），名炜菱，字萱娱，号菽园，又有啸虹生、星洲寓公<sup>②</sup>等别号；是南洋诗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丘氏少年时期在福建海澄接受汉学教养，怀抱传统文化意识，其父早年在新加坡经营米业而成巨富，1896年丘菽园因继承家业而定居新加坡，成

---

\*梁金群，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兼任讲师。Email: gin01262002@yahoo.com.tw

① “丘菽园”之“邱”本作“丘”，清初因避孔子讳而改作“邱”。民国之后，菽园将“邱”改还为“丘”，自营生坟，即写作“丘菽园”，在其他场合也一律写作“丘”。前行学者对于丘菽园之姓氏，有袭用“邱”字及改还“丘”字本姓两种作法。本文则遵从丘菽园本人之意愿，悉改为“丘”。

② 张叔耐《丘菽园传略》：“一八九八年寓星嘉坡，创办《天南新报》，自号星洲寓公。”【清】丘炜菱（菽园）《菽园诗集》，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7页。丘炜菱著作，即丘菽园著作，后文不再赘述。

为南洋当地侨领与诗坛祭酒。创作旧体诗（汉诗）一千四百余首，被誉为“南侨诗宗”<sup>①</sup>、“南洋才子”<sup>②</sup>。

丘菽园也是清末新加坡唯一的举人，曾倡丽泽诗社、乐群文社、星洲檀榭诗社，创办《天南新报》，支持维新运动；又率领侨民上电清廷，反对废光绪立新帝，迎康有为来星洲，慨捐巨款，支援唐才常的兵变等。历任星洲中华总商会秘书、《星洲日报》编辑等职，在南洋华人文化圈颇具影响力。丘氏为人豪迈，惜才如命，凡是到南洋的中国文士，常受到他的热情招待<sup>③</sup>。身处东西文明交汇的英国殖民地，受科学及民主精神启蒙，多元文化冲击，然而他仍肩负起“华化南国”之责，以儒家教养、古典诗教、办报、兴学、选诗刻书等行为，在南洋召唤与延续中华文化道统，彰显独特之境外遗民姿态<sup>④</sup>。

综上所述，丘菽园在南洋汉诗及新马文学的开创及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及重要性<sup>⑤</sup>，目前学界对其姓氏却有“丘”与“邱”字混用的情况。笔者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之论文，写作“丘”字，亦被评论人质疑为讹误，故笔者认为有必要撰文考察先生改还本姓之完整脉络，并呼吁学界统一改还其本姓，以示对其本人意愿之尊重。

本文从文字学视角切入，通过解读“丘”与“邱”二汉字之起源和形义演变，考察中国古代避孔子名讳事件对于“丘”、“邱”于用字层面之影响。从中发现，藉由梳理“丘”与“邱”字的同源关系，及经由隶变或讹写而产生之异体字，也呈现出避名讳制度对于文字形义演变的影响。邱姓之起源，一般认为是由丘姓避孔丘名讳而来，历史上多次重复发生丘姓避名讳事件，尤其在清雍正三年彻底执行后，中国已无丘姓之人。直至民国初年（1911），丘逢甲（1864-1912）呼吁族人恢复丘姓，才又有了“丘”、“邱”二字并行之情况。

<sup>①</sup> 程光裕《南侨诗宗丘菽园》，《星马华侨中之杰出人物》，华冈出版社，1977年，第89-123页。

<sup>②</sup> 《邱菽园生平研究赘言》：“……联合报的李永乐、韩山元、许月英在杜南发策划下联合报导：南洋才子丘菽园生平逸事……”见邱新民《丘菽园生平》，胜友书局，1993年，第1页。

<sup>③</sup> 详参邱新民《丘菽园生平》。

<sup>④</sup> 详参梁金群《华化南国——丘菽园的遗民姿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23年9月第34期，第1-39页。

<sup>⑤</sup> 关于丘菽园文学上的成就，详参陈琼莲《南国谈华化、星洲得菽园：丘菽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2019年，第155-160页。

丘逢甲何许人也？丘逢甲与许南英（1855-1917）<sup>①</sup>是台湾海东书院时的旧友，他虽为传统文人出身，却关心时局与新学，倡议台民自主建立民主国。丘逢甲历经乙未割台、抗日保台、国破家亡的经验，最后选择内渡到中国广东，倡导新学、启蒙民智。辛亥革命时，丘逢甲领导广东独立，而为民国后盾。丘逢甲于人民自决、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和选举等国际公法与宪法学皆有一定的素养及识见，因而勇于扬弃天朝与忠君思想<sup>②</sup>。辛亥革命成功不久，丘逢甲随即登高一呼，吁请族人恢复本姓。而在新加坡的“南侨诗宗”丘菽园亦马上闻之响应，率先改还本姓<sup>③</sup>。丘菽园身处新旧思想交替及中西文明交错之下的英国殖民地，这个举动的重要性，有诸端殊堪注意：

其一、丘菽园改还本姓的内在意涵：此内在意涵即为社会意涵。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意涵是历时性的，是与时代俱变的。先生率先改还本姓的主要力量为何？是来自于新加坡较为自由、开放的社会背景，这种浸淫于现代性，且趋向于西化的社会价值观，赋予丘氏个人行事作风常有独特风格，也较众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此为行动重要的基础。

其二、改还本姓之举，即研析丘菽园新式思想的细微之处，也是理解晚清至民初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路径之一。丘氏自1896年起移居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这是个中西文明交汇之国际化商港，身处现代性语境，结交土生华人如林文庆、李浚源、陈武烈、黄兆奎、孔天增及宋旺相等西化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热心支持维新运动，与近现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叶季允、殷雪村等人交往密切，显然丘氏是深受“新思想”启发之南洋代表性人物。

基于丘氏民国后的档案署名及生前自筑生圻墓志铭皆已改还“丘”姓，可资证明其意愿，故笔者期盼本文能成为学理依据，并郑重呼吁学界尔后撰文讨论时予以尊重，应统一以“丘”字作为菽园先生之姓氏。

<sup>①</sup> 详参许南英著，谢崇耀选注《许南英集》，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年，第13-17页。

<sup>②</sup> 详参李祖基《论丘逢甲思想的时代精神》，《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逢甲大学，1996年，第207-228页。

<sup>③</sup> 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秀威信息科技，2011年，第175页。

## 一、“丘”与“邱”字构形与释义

以下将厘清“丘”与“邱”字之初形本义、隶变与讹写演变历程。

### (一) “丘”字构形与释义:

关于“丘”字的构形,《说文》大徐本及段注本的释形,分列如下:

《说文》大徐本:“𡵓,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𡵓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崙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𡵓。象形。凡𡵓之属皆从𡵓。今隶变作丘。𡵓,古文从土。”<sup>①</sup>

《说文》段注本:“𡵓,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尻(居)在北南,故从北。释从北之意。中邦之尻(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凡北之属皆从北。𡵓,古文从土。”<sup>②</sup>

据上,“丘”是象形字,描绘两座小山丘之形,本义是土丘,与“山”字作三峰之形有别。甲骨文里的写法,𠩺(甲骨文集成04559),是两峰并立之形。后来金文𠩺(金文诂林索引8.206)中,遭讹写为二人背对背站立的“北”形,为小篆字形所本,故小篆字形作𠩺(说文)。战国字形作𠩺(楚系简帛文字),战国文字另有𠩺(战国·楚,包2.237)之形,“丘”下从“土”,则与《说文》古文𡵓之形相近。西汉时隶变后字形作丘(纵横家书157)之形,已高度接近楷书“丘”字之写法<sup>③</sup>。

根据《教育部异体字字典》所载,“丘”之异体字有:𠩺、丘、丘、比、北、业、𡵓、北、丘、𡵓、坵、𡵓、𡵓等十四个。

<sup>①</sup>【汉】许慎撰;【宋】徐铉注《说文解字》,四部丛刊正编本(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卷八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6页。

<sup>②</sup>【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黎明文化,1983年,第390页。

<sup>③</sup>汉语多功能字库,取自:<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9%82%91>

“土”，《五经文字·一部》有“土”字。《类篇·土部》下云：“隶作𡵓，或作土、𡵓。”另外，“丘”字省作“土”。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孔子讳》条下云：“《至正直记》：‘土’字，圣人讳也。”<sup>①</sup>故“土”、“𡵓”、“𡵓”，皆为“丘”之异体字。

《六书正讹》云：“𡵓，小山也，象形。隶作丘，旧说从北，非。”（平声·十一尤侯幽韵·页63·左）《六书正讹》既以为非，可见“丘”实为象形，《说文解字·丘部》篆体作“𡵓”，从北从一，为讹。情况相同者，“𡵓”字盖由“𡵓”及“𡵓”字，因形体相近而讹成<sup>②</sup>。

关于“丘”字之释义，《说文解字·丘部》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尔雅·释丘》云：“非人为之丘。……如覆敦者敦丘，迤邐沙丘，左高咸丘，右高临丘，前高旄丘，后高陵丘。”<sup>③</sup>《孟子·离娄上》：“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sup>④</sup>“丘”皆指自然形成之土山。

古人之坟茔喜欢堆土成丘，方便日后寻祭。所以“丘”也指坟头，如《礼记·曲礼下》云：“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sup>⑤</sup>丘木，指种在坟地的树木。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檄移》云：“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sup>⑥</sup>“发丘”指盗墓，故“丘”字表示坟墓。《墨子·节葬》：“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sup>⑦</sup>以上“丘”字皆表坟墓。

唐代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有名句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sup>⑧</sup>勾勒繁华如梦幻泡影，世事沧桑之场景，“丘”表示废墟。《周礼·春官宗伯》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sup>⑨</sup>“圜丘”指天子祭

<sup>①</sup>【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孔子讳》，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第94页。

<sup>②</sup>教育部异体字字典，取自：[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_rbt?quote\\_code=QTAWMDE1](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_rbt?quote_code=QTAWMDE1)

<sup>③</sup>【晋】郭璞撰；【宋】邢昺《尔雅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114-115页。

<sup>④</sup>【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123页。

<sup>⑤</sup>【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25页。

<sup>⑥</sup>【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里仁书局，1984年，第394页。

<sup>⑦</sup>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3年，第39页。

<sup>⑧</sup>【唐】李白撰；许清云编《李白诗选注》，天津出版社，2020年，第138页。

<sup>⑨</sup>【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342页。



天之坛，“方丘”指古祭地祇之坛。“丘”用作山名，张衡《思玄赋》：“翮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乎句芒。”<sup>①</sup>此处“三丘”指蓬莱、方丈、方壶，三座群仙所居之山。

“丘”字于甲骨文，用作地名，见《甲骨文合集》875，正：“才（在）丘”。金文亦用作地名，见鄂君启车节：“易（阳）丘”。《诗经·国风·卫风》：“送子涉淇、至于顿丘。”<sup>②</sup>《诗经·小雅·巷伯》：“杨园之道，猗于亩丘。”<sup>③</sup>《左传·僖公十五年》：“车说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sup>④</sup>顿丘、亩丘、宗丘，皆为古代典籍中之地名。

“丘”用作姓氏，如元代有丘处机。而金文见于廿七年安阳戈：“工币（师）梁丘。”“梁丘”为复姓，春秋时齐国有梁丘据，汉时有梁丘贺。“丘”用作关口义，如子禾子釜中，有“丘关之釜”之句。“丘关”是齐国关口。“丘”字于战国竹简中，用作人名，如《上博竹书五·季庚子问于孔子》简9：“丘闻之”，此处之“丘”字即指孔子。“丘”为古代约一至十亩大的土地面积。《周礼·地官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sup>⑤</sup>丘，为十六井。《尚书正义·尚书序》中，孔安国云：“九州岛之志，谓之九丘。”<sup>⑥</sup>九丘，又为乡民聚居之处。

综上所述，“丘”字之使用早有悠久的历史。





## （二）“邱”字构形与释义：


关于“邱”字的构形，字形左半作“丘”；右作“邑部”。《说文》大徐本及段注本的释形，分列如下：




《说文》大徐本：“邱，地名。从邑，丘声。去鳩切。”<sup>⑦</sup>

<sup>①</sup>【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  
<sup>②</sup>【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134页。  
<sup>③</sup>【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429页。  
<sup>④</sup>【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233页。  
<sup>⑤</sup>【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170页。  
<sup>⑥</sup>【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7页。  
<sup>⑦</sup>【东汉】许慎撰；【宋】徐铉注《说文解字》，四部丛刊正编本（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卷六下，第5页。

《说文》段注本：“邱，地名。从邑。北声。去鳩切。古音在一部。今制、讳孔子名之字曰邱。”<sup>①</sup>




据上，“邱”这个字，是个从“邑”、“丘”声的形声字，原本指地名。“邑”部，商代甲骨文作（甲骨文合集 0305）、金文作（臣卿鼎【西周早期】2595）、简帛文字作（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21）小篆作（说文）。甲骨文及金文，“邑”字皆从“口”，因夏商城墙多呈方形。从“卩”，象跪坐之人。《释名·释州国》云：“邑，人聚会之称也。”故，“邑”字本义指人聚居的地方。此外，古人重视国都，以“都”为“国”的代表。国名、都名往往相通。如商代盘庚迁都于殷后，商朝又称为“殷”。故“邑”通称为“国”。甲骨、金文屡称大邑商、天邑商，意指商国。卜辞如“才（在）大邑商”（《合集》36530）。金文用作氏族名、人名外，亦表示都邑，如洹子孟姜壶：“其人民都邑。”又用作区域单位，齐罇：“侯氏易（赐）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邑”字，于战国文字则多用为地名。故《说文》释“邑”字曰：“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卩。凡邑之属皆从邑。”<sup>②</sup>

综上所述，“邱”字于战国楚时期（陶汇 5.384）字形作，从“邑”，表示“邱”字是地理名称。“邱”字，无论大徐本之“丘”声，或段注本之“北”声，皆从“邑”，用作地名。“丘”在“邱”字里是声符，“丘”为象形字。故“邱”字从邑丘声，原义为一个有土山的地理区域。清段玉裁注：“今制，讳孔子名之字曰邱。”进一步说明了“邱”与“丘”二字之关系，“邱”之所以从邑，“北”声，乃因“邱”与“丘”二字古音在一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本处所称“今制”，指清朝雍正三年，为彻底执行避孔丘名讳制度，下诏命令所有“丘”姓者皆改“邱”姓一事。

邱字构形演变历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丘”这个部件，在“邱”字里既是声符，也兼能表意。“丘”是象形字，全字描绘小山之形。甲骨文（甲骨文合集 1220）及（甲骨文合集 H33738A），皆是两峰并立。金文（商丘吊簋【春秋早期】

<sup>①</sup>【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黎明文化，1983年，第286页。



















<sup>②</sup>汉语多功能字库，取自：<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9%82%91>


4558) 已讹写为二人相背之形, 战国字形 (上博竹书一·孔子诗论·21), 小篆字形 (说文),  (纵横家书 157) 为西汉时隶变字体, 已高度接近楷书“丘”字之写法。“邱”字于先秦文献如《孙子兵法》及《韩非子》中, 也泛指山丘之义, 可证“丘”这个部件, 在“邱”字里除声符外, 亦兼具表意功能。

关于“邱”字的释义, “邱”字仅出现于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喻老》中: “纣为肉圃, 设炮烙, 登糟邱, 临酒池, 纣遂以亡。”<sup>①</sup>泛指山丘之义。另外, “邱”字同“丘”, 见说文段注本可知。汉代以后为避孔子名讳, 凡遇“丘”字, 皆加邑旁为“邱”, “邱”字之释义开始扩大。清雍正三年以后, 除四书五经外, 凡遇“丘”字, 必加邑旁为“邱”, 州名、地名、姓名, 各种名词或用字皆一律改用“邱”。此后, “邱”字之释义全面扩大。

### (三) “丘”与“邱”字的关系

“邱”字, 从“邑”, “丘”声。“丘”为初形, “丘”为声符, 兼表音与表义功能。今本先秦典籍一律作“丘”, 后世文献“邱”、“丘”二字常互通, 但清雍正三年以后仅孔子名作“丘”, 其他丘字皆改为“邱”。故“邱”、“丘”二字语义相通(或相同), 声音相同, 属于一组同源字。

参照表1、“邱”与“丘”字构形关系表, 可见“邱”、“丘”二字于各自的异体字构形上, 也密切相关。如“丘”的甲骨文, 象二峰形, 金文讹变为, 象二人背对背站立的“北”形, 为小篆字形所本。战国文字则为“丘”下从“土”, 与《说文》古文之形颇相近。此字形上体承自小篆形, 下体承自战国文字。由于古代文字部首位置可左右及上下置换, “土”部件的加入, 造成讹变为、、、、等异体字。丘字的隶变, 则与、、、、等异体字的出现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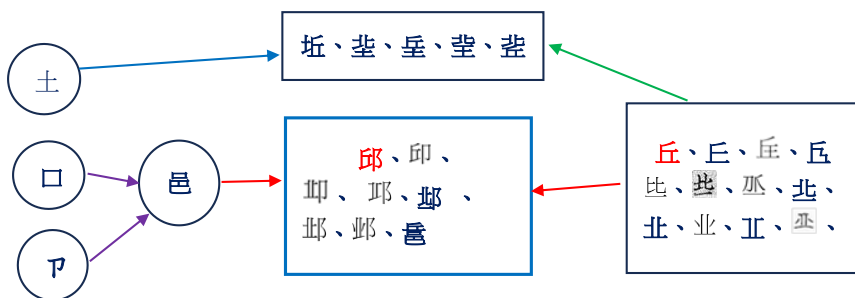
“邱”字于战国楚时期(陶汇 5.384) 字形作, 从“邑”, 表示“邱”字是地理名称。“邱”字, 无论大徐本之“丘”声, 或段注本之“北”声, 皆从“邑”, 用作地名。“丘”在“邱”字里

<sup>①</sup>【清】王先慎撰; 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中华书局, 1998年, 第12页。

是声符，“丘”为象形字。故“邱”字从邑丘声，原义为一个有土山的地理区域。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层下令避孔子名讳，共有西汉时期汉武帝、金朝时期重修曲阜孔庙，及影响最大之清雍正三年，共三次，是造成“丘”氏分化出“邱”氏的主因。人们于用字习惯被迫改变，实际使用文字的层面上，“邱”字也成为“丘”字的假借字。避名讳制度对于“丘”字构形的影响，直接反映在“丘”、“丘”二个异体字上，前者为避名讳而缺笔，后者则为避名讳而增笔。

表 1：“邱”与“丘”字构形关系表



## 二、丘姓本源及改“邱”姓历程

### (一) 丘(邱)姓来源

依据《百家姓考略》：“按原本邱字不从邑，近以孔子圣讳增之。”<sup>①</sup>可知“邱”这个姓氏是从“丘”演变而来，其实两姓本是同源。“丘”氏之所以分化出“邱”氏，一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避孔丘讳，令丘加“邑”（阝）部改为邱。二是金明昌三年（1192），重修曲阜孔庙，命臣庶回避孔丘之名，其域内丘姓改邱姓。但影响最大，范围最广泛的一次丘改邱姓，是清雍正三年（1725），颁诏尊师重道，称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凡姓氏、地名，“丘”字一律加“邑”旁部首，改为“邱”字。从此，中国再无“丘”姓。由此可见，该姓原

<sup>①</sup>【清】王相《百家姓考略》，《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本皆写作“丘”，是后来渐渐改成“邱”的，而且多与避名讳制度有关。丘、邱同宗同源，是不争的事实<sup>①</sup>。

纵观古籍，名字之前冠有“丘”字为氏者，最早见于《孔子家语》中“少时好学、周徧天下、长事齐君”的孝子丘吾子。公元前521年，孔子三十一岁适齐，遇丘吾子。丘吾子泣告其有“三失”，悲叹“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遂投水而卒<sup>②</sup>。此外，以“丘”字为氏者，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鲁国左史、号称文宗史祖的《左传》作者、史称左丘明的丘明公。丘姓来源为何？主要说法有四：

### 1. 源自姜姓

最早述及丘氏由来的古籍为唐《元和姓纂》云：“齐太公封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世居扶风。（西）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汉，遂留江左，居吴兴也。”<sup>③</sup>又：“吴兴：丘俊居吴兴乌程。松江太守丘灵鞠生迟，梁永嘉太守。五代孙仲升，唐开临尉，宋西侯丘道让，亦俊后，七代孙悦，岐王傅，昭文学。”<sup>④</sup>

《四库全书·氏族大全·卷十一》载：“丘：宫音，河南。齐太公封于营丘，其后以地为姓。”<sup>⑤</sup>《姓考》、《姓篇》云：“丘，齐太公封营丘，子孙以地为氏。”《著姓》云：“左丘明盖姓丘而官为左史。”孔府档案《左传精舍志·卷五》云：“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营丘，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支子印，遂以丘为氏。”<sup>⑥</sup>

综合以上诸说，从“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姓，世居扶风”，可证其来源为齐太公，也就是封于营丘的姜太公，此群体于南北朝时期已经由中原和北方移入江南，形成吴兴丘姓望族，也是丘姓来源之最大宗<sup>⑦</sup>。

<sup>①</sup> 邹潜智《你知道你的姓氏是什么意思吗？》，五南出版社，2014年，第324页。

<sup>②</sup> 详见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22年，第70页。

<sup>③</sup>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第283页。

<sup>④</sup>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第283页。

<sup>⑤</sup> 【元】佚名《氏族大全》卷十一，黄山书社，2009年，第32页。

<sup>⑥</sup> 转引自袁义达、邱家儒主编《中国四百大姓（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5-226页。

<sup>⑦</sup> 邹潜智《你知道你的姓氏是什么意思吗？》，第324页。

## 2. 源自妘姓

丘姓最早的起源则是夏少康么儿曲烈，封地在郟（今河南省柘城县北），郟国又名曾国，存在一千多年。传到春秋时期，至周灵王时，由于改而投靠晋国、鲁国，招致莒国不满，旋即出兵灭曾。曾国子孙去邑以亡国名“曾”为氏，其后“曾”氏分支中为“丘”氏。此为曾、丘同宗之说。

## 3. 源自妘姓

以地为氏说。春秋时，陈国（开国君主是胡公满）有宛丘，邾国（传为颛顼后裔挾所建，曹姓）有弱丘，居者皆以“丘”为氏。《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 519 年，亦有“邾人城翼”的邾大夫丘弱公之记载。

## 4. 他族改姓而来

还有外族改姓说。如汉代乌桓国的少数民族乌桓族有“丘伦”及“丘力居”氏，由复姓改为汉字单姓“丘”。《元和姓纂》云：“河南：后魏献帝七分国人，以弟豆真折为丘敦氏，封临淮王，孝文帝（471-476）改为丘氏。”<sup>①</sup>从上述唐代古籍中可见，南北朝时，外族复姓丘敦氏者，改汉字单姓“丘”之事实。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鲜卑族复姓丘林氏者，亦改为汉字单姓“丘”。

以上数支以丘为姓的宗族，即为丘姓之四大来源，清雍正之后皆改为邱姓。直至 1912 年，辛亥革命后，民国参议院议员丘逢甲等登报呼吁丘姓族人恢复本姓。当时，闽、粤、台及海外部分丘姓人士闻之响应，其中包含“南侨诗宗”丘菽园在内。然而，多数丘姓人士或因不知情，或涉及法律户籍等诸多问题，仍然使用邱姓。故丘、邱二字通用至今。

## （二）中国避讳学及丘姓避孔子名讳

### 1. 中国避讳学

避讳是中国古代礼俗之一，起源于古老的语言禁忌。古人以为语言与自然现象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联系，语言可能给人类带来幸

<sup>①</sup>【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第 284 页。

福或灾祸，语言禁忌遂应运而生。人们为了趋吉避凶，便出现避讳之举。如殷商卜辞中，贞人代王占卜，留下“王卜曰”等多处甲骨文记载，商代称时王而不名，铭文器主则称其父母祖先以日干庙号之作法。反之，自卜辞中可见，王对于诸侯臣工妇子，则直呼其名。范志新认为，足见“殷商已有上可名下、下不可名上的等级的社会属性，昭示了避讳之俗，至迟萌芽于殷商。”<sup>①</sup>

观诸古籍，有《礼记·王制》云：“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齐戒受谏。”<sup>②</sup>郑玄注：“讳，先王名；……是亦讳诸侯之祖父也，云恶忌日。”<sup>③</sup>《周礼·春官·小史》云：“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昭王之忌讳。”<sup>④</sup>郑玄注：“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sup>⑤</sup>此为较早论及避讳之礼的纪录。其中，大史、小史都是司讳礼的职官，既有分工如此细致的职官之设，应当可证明礼讳之制，早已发轫并形成于西周，甚至已具备了定制。

此外，避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避讳包括避名讳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禁忌，如年龄禁忌、属相禁忌、凶祸词语等等。狭义的避讳专指避名讳，它规定人们遇到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时，必须设法避开或改写。一旦犯讳，无论官民皆可能招致大祸。因而避讳成为统治者维系宗法制度的工具，它最终演化为一种具体而完备的制度，甚至可称之为避讳学。

古人避讳有国讳、家讳、宪讳、圣讳等几种形式。国讳，就是对君主或圣贤的名字进行避讳。如唐高宗名李治，唐人文章常以“理”代“治”。为此，帝王取名时大都取单名，或尽可能取冷僻字，如宋徽宗名“佖”，武则天甚至给自己新造了一个“曩”字。其次为家讳，就是对祖先和尊长的名字避讳。如司马迁之父名司马谈，司马迁写《史记》时，将“张孟谈”改为“张孟同”。在《报任少卿书》中则称“赵谈”为“同子”。宪讳，就是指下属官员对上级长官的名字的避讳。圣讳，则是对“圣人”如孔子、孟子名字的避讳。例如清雍正时，“丘”姓改为“邱”字姓，便因回避孔丘名讳而致<sup>⑥</sup>。

<sup>①</sup> 范志新《避讳学》，学生书局，2006年，第18页。

<sup>②</sup>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262页。

<sup>③</sup>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262页。

<sup>④</sup>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403页。

<sup>⑤</sup>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403页。

<sup>⑥</sup> 详见郭迎春《古代避讳之礼举要》，《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2006年第4期，第41-43、88页。

而避讳之方法，依据佟淑云，大致有下列几种：

(1) 改字。一般用义同或义近之字代替，也有借用同音字代替者。如汉景帝名启，以“开”改“启”。明光宗名常洛，改“常”作“尝”，改“洛南”为“锥南”，皆属此例。(2) 缺笔或增笔。即对所避之字不写完整，使之缺少或增加一至两笔，以示隐讳。如孔名丘，“丘”字缺笔为“𠂔”，音读如“某”。“丘”字增笔字则为“𠂔”。(3) 空字。对所讳字不写，或作空围“口”，或作“某”，或作“上”，或作“讳”字。例如《史记·孝文本纪》云：“子某最长，纯厚慈仁，清建以为太子。”其中，“某”即指汉景帝刘启。《史记》、《汉书》为避国讳，对西汉诸帝均以“上”代替<sup>①</sup>。

综上所述，古书中为了避讳，常有随意改变人名、地名、官名、书名，任意改变文字笔画等作法，此种违反知识及阻挠讯息传递正确性的举动，却因语言禁忌、统治者的推波助澜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得到强化。因此，避名讳制度变得愈发“名正言顺”、“变本加厉”，甚至产生“因讳废名”的情况。

## 2. 丘姓避孔子名讳改丘为邱

清雍正三年（1725）皇帝下诏改“丘”姓之圣谕《诏避至圣先讳改为邱字读为期音》，节录如下：

上谕内阁九卿等，古有讳名之礼，所以昭诚敬致尊崇也。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伦、端风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受师资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圣讳字在内者，古今相沿未改，朕心深为不安。尔等会议，凡直省地名有同圣讳者，或改读某字，或另易他字，至于常用之际，于此字作何回避一并详议，具奏寻遵旨议覆。

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惟祭天于圆丘丘字不用回避外，凡系姓氏具用偏旁为邱字，如系地名则更易他名。至于书写常用之际，则从古体卍字得旨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卍字，是仍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用邱字，地

<sup>①</sup> 详见佟淑云《谈古代的避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6-17页。



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偏傍读作期音。庶乎允协足副朕尊崇先师至圣之意。<sup>①</sup>

上述清雍正皇帝的圣谕原文，清楚呈现了“丘”姓改“邱”姓之历史脉络。改姓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极严重之大事，雍正帝却因个人对孔子的尊崇，而令全国姓丘之人改姓，此举确实专制，不但造成许多人延续家谱撰写的困难，也呈现了皇权极端主义彻底执行的实况。然而，直到今天，即使已经知道丘与邱同属一姓，不容置疑。“丘”姓才是正确的，世界各地的华籍人士，依然有许多邱姓人士继续沿用“邱”姓至今，其原因为何？反之，本论文考察的对象，“南侨诗宗”却是率先响应丘逢甲之呼吁，为南洋最早改还丘氏本姓者，其原因又何在？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 三、丘菽园改还本姓之初始动机

关于丘菽园改还本姓之初始动机，是因响应丘逢甲 1911 年改还祖先姓氏之呼吁。其历程如下：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近代诗人，也是教育家的丘逢甲（曾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咨议局议长），认为丘姓得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封地营丘，早于东周春秋时人孔丘，无前人避后人讳之理；民国初兴，正是大破大立时刻，民主时代之人大可扬弃避名讳这种封建意识了。于是丘逢甲与祖居地福建上杭的清举人丘荷公（又名复）等联名上书中央政府，请求除去“邱”之“邑”部，力主恢复“丘”氏本来面目，并在粤闽两地登报呼吁族人改还祖先肇姓之丘。经由丘逢甲登高一呼，闽、粤、台部分族人，特别是客家地区的邱氏宗亲闻之群起响应，改“邱”为“丘”。但有些族人未闻此议，或考虑改还本姓将涉及法律、户籍等诸多问题，则决定继续沿用“邱”，以致如今“丘”与“邱”两姓并用及通用。

而身在海外的丘氏族人当中，1896 年移居新加坡的“南侨诗宗”丘菽园，可说是率先响应丘逢甲之呼吁，并身体力行，自 1911 年之后，改还本姓之南洋名人。笔者认为，丘菽园改还本姓，并非偶然之单一事件，其表面动机虽看来单纯，似乎仅因来自于响应好友丘逢甲之呼吁。内在意涵则相对复杂得多，且具有深刻的历史与

<sup>①</sup>【清】张廷玉等《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台北新兴书局，1958 年，第 14-15 页。

文化典型意义。丘菽园之所以成为在南洋改还本姓之首位名人，其举动恰好是时代之产物，反映了其身处时代（晚清至近现代时期）及定居地（西化之英国殖民地新加坡）之绝对当代意义与历史背景。笔者好奇的是，如果丘菽园不是生于这样的时代，也未定居在海外英国殖民地，倘若失去了这样的语境，丘菽园还会对于丘逢甲的呼吁产生相应的变化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以下将从西化影响下之新加坡现代性语境，及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新思想启蒙，两个面向考察其改还本姓之内在意涵。

### （一）西化影响下之新加坡现代性语境

新加坡面积约为 616 平方公里，位居马六甲海峡的要冲，在地理上是东南亚或南洋群岛的核心点。19 世纪，大英帝国与荷兰在南洋群岛之间展开资源掠夺，领土扩张与势力竞赛。英国急欲于此区域寻找一个港口，作为商船队停泊据点，以遏制荷兰之势力扩张，原本不起眼的小渔村新加坡雀屏中选。181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莱佛士（T. S. Raffles, 1781-1826）登陆新加坡。当时，全岛居民仅有马来人 100 多人与华人 30 人。

清代徐继畲《瀛环志略》一书，描述新加坡千万商船云集：“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埠头。”<sup>①</sup>新加坡也是中国第一个在海外设置领事馆之处。1832 年，新加坡已发展为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的首府。1867 年，甚至成为英国政府直辖的殖民地。1881 年大清电报总局成立后，加速电报海底电缆环球体系的铺设，电报服务已达新加坡。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的新加坡，因自身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机遇，加上莱佛士以“自由港”概念经营等增值因素，使之发展蓬勃，在亚洲与世界经济中持续扮演着多样且多边的功能，成为各种力量交汇所在，并逐渐建立成为繁荣的贸易金融和移民中心。

斯坦·尼尔（Stan Neal）在其著作《新加坡，华人移民与大英帝国的形成，1819-67》中，揭示英国如何将“新加坡模式”，复制到其他地区，如印度阿萨姆邦、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毛里求斯、澳大利亚和西印度群岛，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新加坡从一个贸易站转变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关键因素即是自由贸易和招募及使用“勤劳”的中国移民劳工而不是“懒惰”

<sup>①</sup>【清】徐继畲撰；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5 页。

的当地人。本书审视了该开发模型背后的核心思想，并评估了不同的殖民实验的不同结果<sup>①</sup>。

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英殖民政府挟带着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与本地人及流寓者，不断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层面上相互争夺权力、进行共构与折冲，殖民者为有效治理这新兴的港口城市，遂以强势姿态建构一套现代性（modernity）叙述，告诉被殖民者西方文化的优越，本土传统仅属次等。统治者以文明的传道者自居，透过在人权、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等显著“优越”，合理化对于他族的经济压榨、政治上的抑制以及统治上的不平等。

关于新加坡多元社会的管理机制，殖民政府采取在被殖民者族群内部建构其成员的统一性，在外部则建构差异性的策略。简而言之，即为“分而治之”。例如，华人内部包含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方言群，外部则有界线更清楚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这种分类原则有利于透过各族群内部领袖分而治之。新加坡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后，“消费者”、“雇主”、“工人”和“国民”这类现代性的个体身分认知，也被逐渐引进来强化不同族群的边界，以利殖民统治与管理。

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是从马六甲移居的峇峇华人（Baba）<sup>②</sup>，他们具备优秀的语言与经商能力，能作为英国殖民者与本地人沟通的桥梁，很快成为新加坡的领导阶层<sup>③</sup>。其他华人则来自中国沿海如福建、广东、海南各省，目不识丁的劳工最多数，其中小部分则为流寓南洋的知识分子。根据 1891 年的统计，华人移民增至 121,098 人（占各族总人口的 66%），至 1911 年增为 219,577 人（占各族总人口的 72%），1931 年增至 421,821 人（占各族总人口的 75%）<sup>④</sup>。从 1931 年新加坡人口的种族成份来看，华人 75%、马来人 12%、印度人 9%、其他人种 4%<sup>⑤</sup>，可见主政者经营得法，新加坡经济繁荣，多元文化社会已然成型。

---

<sup>①</sup> 详参 Stan Neal, *Singapore,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19-67*, Boydell Press, 2019.

<sup>②</sup> 又称土生华人或海峡华人，是指中国移民和东南亚原住民通婚的混血后裔。

<sup>③</sup> 详参【美】孔复礼著；李明欢译《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16-219页。

<sup>④</sup> 详参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五南出版社，2003年，第260-261页。

<sup>⑤</sup> 郑帼英《新加坡——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社会政策之研究》，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年，第179页附表。

1932年，丘菽园曾撰写一首竹枝词描述新加坡街头不同肤色、语言相异的多元民族融合情况：“黄红棕白黑相因，展览都归此岛陈。十字街头聊纵目，五洲人种各呈身。”<sup>①</sup>华、洋、巫、印杂处的文化差异，北京话、英语、马来语、印地语、泰米尔语、福建话、广东话、潮汕话的语言差异，形成新加坡生气盎然、有趣、复杂，甚至时相冲突的跨文化语境。这就是曾被丘氏戏谑为“人种博览会”的蕞尔小岛。

依据纪登斯（Giddens）之论述，现代性历程基本上由四个制度层面互动产生，即资本主义、工业化（industrialism）、监控能力（surveillance capacities）与军事力量或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control of the means of violence）<sup>②</sup>。英政府在新加坡对于本地社会大众建构的一套现代知识，主要透过印刷媒介如《叻报》、《天南新报》等长期译、转介及鼓吹过程，加上新制学校、“好学会”、华人大会堂等社团或文化机制，现代性不断进入新加坡非西方社会，进而让现代知识与在地历史、文化等遭遇、协商、混合、转化与创造，最后经由西方殖民者的逻辑分类与筛选机制，建构出属于新加坡本地的新知识与新文化。

其中，印刷媒介是为东西方文化调和、接合与转介的文化机制，也是殖民政府最重要的现代性工具。论者指出，殖民政府很可能为了更强化一个多元异质社会，促使各种语言报纸在1870年代后在新加坡出现。首份中文报刊《叻报》在1881年创办，开始透过印刷媒介建构华人的文化认同与现代性观念<sup>③</sup>。对于西方现代性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推展而言，《叻报》之外，《天南新报》也是一个重要的新式思想传播管道，它以接近中国“传统”的形式，将现代性元素透过中文进行传播，更亲近读者与更具有说服力。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述成为主流后，中国人对于西方新媒介的使用是将其视为“器”，其重点是承载中华文化，也透过新媒介这个平台来传播现代观念与西学等“进步”知识，这也强化了社会现代化的工具理性思维。

在初期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担任西方统治者与在地商人的中间人，新加坡土生华人买办也是关键因素。这个特殊族群吸收了中

<sup>①</sup> 《星洲竹枝词》（八首之一），《星洲日报》（第15版）1932年10月2日。

<sup>②</sup> 【英】安东尼·纪登斯、菲利普·萨顿著；许雅淑、李宗义译《纪登斯的社会学基本概念》，《商业周刊》2021年，第26页。

<sup>③</sup> 黄国富《在传统与现代性译之间的媒介实践：新加坡〈叻报〉的萌芽与开展（1881-1911）》，《传播研究与实践》2015年第5卷第2期，第155-192页。

西不同元素，多能掌握一定的“现代”知识与观念，成为西方现代性译过程中的重要知识与文化中介。他们在各种地域、文化与资本中移动，在东西贸易上扮演重要角色，让不同体系的商贸方式能够运转，且不仅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中间人，甚至是多种文化的中介沟通者。土生华人的跨域能力，让现代性论述与实践取得更好的发挥，对当时的统治情势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sup>①</sup>。

谢冰指出：“丘菽园虽是传统读书人，但早年游历域外，眼界开阔，善于吸收新知，是中国早期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能将西方知识与中国传统知识对接。”<sup>②</sup>丘菽园本人也研读西学，认同英国的现代化制度和组织，爱谈西方的进化论和自由论，赞赏西方重视科学和权利的精神<sup>③</sup>。其所著《菽园赘谈》中，有多篇文章涉及近代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例如《化学原质多中国之物考》一文，丘氏将现代化学元素与中国传统事物对应，并尝试为其溯源，可说是早期甚为罕见之西方科学考察文章。丘氏在《天南新报》发表的《中国宜破锢见论》<sup>④</sup>和《时务愤谈》<sup>⑤</sup>等文章，也显然是受了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

综合上述，可知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也是中西文明交汇之处，丘氏 1896 年移居这个西化程度较高的国际商港，身处现代性语境，当时活跃于本地文教舞台的菁英有林文庆医生、李浚源、陈武烈、黄兆奎、孔天增等<sup>⑥</sup>。其中，林文庆与丘菽园的交情最为深厚，他接受英文教育，是第一位拿到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深造的华人，他一再强调海峡华人是英女皇的子民，也申辩绝不忘记华族的身分，他肯定晚清知识分子救亡的改良主义运动，又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李浚源是金融家，创建孔庙学堂董事，兼通中英文，热心公益，几乎参与了所有改进海峡华人社会和文教的运动。陈武烈为莱佛士书院毕业生，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发起人，也是福建社群天福宫的重要领导人。黄兆奎也曾就读莱佛士书院，是一位律师，兼通中英文，任《马来论坛》董事，扮演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与中华商务总会之间的桥

<sup>①</sup> 详参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年，第 88-89、98、104-107 页。

<sup>②</sup> 谢冰《前言》，丘炜菱《菽园赘谈》，厦门大学，2018 年，第 4 页。

<sup>③</sup> 蒙星宇《丘菽园创作之背景》，《南洋奇葩——东南亚华文古体文学个案研究之丘菽园》，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 4 页。

<sup>④</sup> 丘炜菱《中国宜破锢见论》，《天南新报》（第 1 版）1898 年 11 月 17 日。

<sup>⑤</sup> 丘炜菱《时务愤谈》，《天南新报》（第 1 版）1898 年 8 月 17 日。

<sup>⑥</sup> 详参陈琼莲《南国谈华化、星洲得菽园：丘菽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2019 年。

梁。孔天增毕业于英华书院，后赴印度深造，专研图书馆学，担任好学会的顾问，在《海峡华人杂志》发表英文作品，是一位杰出的中英学者。以上这些都是学贯中西的土生华人，也是经常横跨中西文化和教育领域，跨越社群的文教活动，关怀社会的知识分子<sup>①</sup>。丘菽园曾经与他们一起出现在新加坡的历史舞台，丘菽园眼界开阔，善于吸收新知，又是中国早期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能将西方知识与中国传统知识对接。因此，思想上免不了多少受到这些社会菁英西化思想及作风的影响与启发。

## （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新思想启蒙

清末国运日衰，中华帝国苟延残喘，民不聊生，中国沿海居民纷纷“下南洋”自谋生路。值此“大流亡时代”，新加坡成了南方移民重镇，商人、文人、百工、苦力麇集。英国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特意培养海峡土生华人林文庆、宋旺相等人协助治理华人社会，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中西文明汇聚交流，商业蓬勃发展的海港城市。1877年，清廷在新加坡成立领事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组织华人传统节日的庆典，开始提倡华文教育。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郁达夫、许南英相继至此，再度提升了本地的中华文教资源，维护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讲演活动和孔教复兴运动随之发展蓬勃。新加坡遂成为“中国文学的境外营运中心”<sup>②</sup>，此地华人社会的侨领，也是文教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则是被誉为“海国诗坛盟主”的丘菽园<sup>③</sup>。

事实上，丘菽园改还本姓之举，反映了晚清至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路径；他身处域外，一直非常重视西学，对于西方人的进步有颇多实际体验，故认为亟思富强的中国，必须积极吸收“现代知识”，学习西方的知识与长处。这是其思想核心。19世纪末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正处于成形阶段，更多华南移民向南迁移，在新加坡这个新兴城市体验西方现代性的撞击，且活络的流动状态使

<sup>①</sup> 李元瑾《比较研究：三种回应模式的定型》，《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年，第365-367页。

<sup>②</sup> 语出张锦忠《海外存异己：马华文学朝向【新中华文文学】理论的建立》，《中外文学》2000年第29卷第4期，第22页。

<sup>③</sup> 语出余美玲《苍茫家国千行泪：试论〈金城唱和集〉的诗情与感怀》，《纪念丘逢甲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逢甲大学，2011年11月，第31-42页。

得各种文化在新加坡展开相互渗透与影响。其中，丘菽园这类中国传统文人型的新加坡知识阶层，亟思中国奋发图强。此时，不满清廷腐败而出现的维新派与革命派，遂得以透过知识去说服海外“同胞”参与神州大地的改革。中原不同力量以各种方式与管道建构知识，新加坡因此成为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派与孙中山革命派传播“新思想”的重要竞争场域，这些力量的介入与在地力量的结合及协商，使得在新加坡所发展的现代性内涵更显复杂。

高嘉谦指出，丘菽园创作的汉诗投射他的名士性格：

热衷诗学雅兴的交际，同时高扬汉诗的旗帜，将诗想象为一种沟通中原与孤岛的交流媒介。虽处南洋小島，他不断往中原内地与殖民地台湾结交诗友，主动搭建酬唱风气，为这些流离在帝国巨变情境下的文人，找到跨境交流的形式。南洋汉诗由此在区域汉文学的网络中找到了坐标，藉由丘菽园的主导，替流寓者诗学开启了南洋地缘关系的实践。<sup>①</sup>

丘菽园 1899 年的《诗中八友歌并序》，列举康有为、黄遵宪、林鹤年、唐景崧、潘飞声、丘逢甲、王恩翔、梁启超等八位近代名士，并各有评价，考察丘氏与这八位诗友的唱和诗作，可见此八人在其心中占据颇高的地位<sup>②</sup>。

黄建淳更明确指出，丘菽园“思想，多系接受国内维新志士如康有为、唐才常、章太炎、丘逢甲、容闳、梁启超等人的影响”<sup>③</sup>。甲午战争后，改良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并掀起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变法主张包括发展民族资本经济、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树立新的文化教育制度，以及新的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sup>④</sup>。1895 年，在中国读书应举的丘菽园很受影响，写诗表达了对康有为的仰慕，当时他从北京南返小住上海，“见坊肆中人，争翻南海康氏殿试策”<sup>⑤</sup>，于是“购

<sup>①</sup> 高嘉谦《流寓者与诗的风土——丘菽园的星洲风雅》，《遗民、疆界与现代性（1895-1945）：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联经出版社，2016 年，第 404 页。

<sup>②</sup> 丘炜菱《诗中八友歌并序》，《菽园诗集》，文海出版社，1977 年，第 61-62 页。

<sup>③</sup> 黄建淳《星洲丘菽园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淡江史学》1997 年第 7 卷第 8 期，第 30 页。

<sup>④</sup> 详参李泽厚《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2 年。

<sup>⑤</sup> 丘炜菱《题康氏对策副本有序》，《菽园诗集》，第 41 页。

览一帙，漫题卷首，聊志闻声相慕之雅”<sup>①</sup>。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辗转流亡至香港，极力宣扬维新变法思想，介绍近代政治的新知识，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与法治的原则，更大声疾呼海外臣民应联合上书清廷，要求光绪皇帝复政<sup>②</sup>。丘菽园以具体而积极的行动响应维新运动，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鼓吹变法，连同林文庆组织“好学会”，俨然成为侨社维新派的领袖。1900年2月，康有为更在丘菽园的资助下，抵达新加坡。康、丘异地相逢，一见如故，丘菽园以《庚子开岁之三日，喜晤康更生（有为）先生》为题<sup>③</sup>，赋诗奉迎。此后，梁启超的门生秦力山与维新志士唐才常等人筹设“自立会”，拟发动汉口起义，丘氏更为此计划捐献了叻币二十五万元巨款<sup>④</sup>。1922年，康有为于《啸虹生诗钞》序中，称丘菽园为其门人，并出资为破产后落入穷籍的丘菽园刊印此部诗集，可证二人确有师生情谊<sup>⑤</sup>。

对于丘菽园的“新思想”影响次之的人物则是丘逢甲。“教育救国、广开民智”是丘逢甲贯串一生的理想，乙未割台后，他内渡回到广东祖籍地，曾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主讲，他体认到旧式书院的弊端，为振兴国势，遂毅然创办新式东文书院、岭东同文学堂等新式学堂。力主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增设数学、哲学、化学、生理卫生、外语（英、日）文、体操等新课程，引进新知识、新思维，为国家培养人才。其新式教育的实践，培育了不少具有新观念及爱国思想的革命志士，促进了广东福建等南方省份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

二人于1897年丘逢甲抗日保台失败后开始书信交往，据丘菽园《挥麈拾遗》中记载：“仙根（丘逢甲）诗之钞寄余处者，起乙未秋，迄庚子夏，约五百首，号蛰庵诗存。”<sup>⑥</sup>从中可管窥二人友谊之深厚。逢甲于此年为《菽园赘谈》一书作序，表达的是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担忧，还有对时局的全面评价，可见这是二人交往经常谈论的核心议题<sup>⑦</sup>。

<sup>①</sup> 丘炜菱《题康氏对策副本有序》，《菽园诗集》，第41页。

<sup>②</sup>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211-220页。

<sup>③</sup> 丘炜菱《庚子开岁之三日，喜晤康更生先生》，《菽园诗集》，第57页。

<sup>④</sup> 黄建淳《清末马来亚侨社对维新与革命的响应》，《淡江史学》1994年第6卷第6期，第181页。

<sup>⑤</sup> 康有为《丘菽园诗集叙》，附於丘炜菱《啸虹生诗钞》卷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sup>⑥</sup> 丘炜菱《挥麈拾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

<sup>⑦</sup> 丘逢甲《菽园赘谈序》，《菽园赘谈》，第14-19页。



在丘菽园力邀之下，1900年3月，丘逢甲偕王晓沧等人实现了以“兴学保种”为目标的南洋行。一行人首先抵达新加坡会见众多华侨，并以“兴孔教、建圣庙、设学堂”为主轴，分别在马来亚槟榔屿、霹雳怡保（旧称吧罗）及吉隆坡等各大城市展开巡回演说。由于菽园长期以来对逢甲推崇有加，并通过《天南新报》对其言论做了宣传及报导，各地演说场次万人空巷，也促使华文教育在马来亚遍地萌芽<sup>①</sup>。这次知己相见，菽园与逢甲二人，有多首唱和诗作，如丘逢甲《饮新嘉坡觞咏楼次菽园韵》<sup>②</sup>及《寄家菽园孝廉炜菱新架坡》，丘菽园《后夜宴即席作》<sup>③</sup>等，皆能管窥当时二人沉浸于追寻共同理想之美好氛围。丘菽园曾赞曰：“逢甲‘借题抒诚，热心君国，为能不媿（愧）此新世界人物也！’”<sup>④</sup>由此可知，菽园对逢甲的感佩之情。

此外，中国流寓文人中，叶季允与殷雪村，也是丘氏“新思想”的重要启蒙者。叶季允1881年来自香港，为新加坡首份中文报刊《叻报》之主笔，与丘菽园感情甚笃，时有诗歌唱和。叶氏重视传统中华文化的革新，也认为西方“进步”科学与观念很重要。因此，在办报与写作的策略上，叶氏主要鼓吹破除迷信与陋俗，主张科学理性的精神，以“国家”富强与现代化为前提，将西方现代性元素透过中文进行传播。《叻报》刊登的各种讯息许多来自当地西报和外电，通过译西学与现代性，让读者更了解与亲近西方，或针对中国和新加坡在地情境撰写社论<sup>⑤</sup>。在“民主”观念的推广上，有讨论西方立法的重要性，如《中西律法利弊论》<sup>⑥</sup>、《自由辨》<sup>⑦</sup>、《说权利》<sup>⑧</sup>等文章，则对西方民主观念与制度有颇为推崇。在“科学”观念的推广上，早期传统中国农民认为火车铁轨是个贯穿祖先坟地、破坏风水的“现代”怪物，因此抗拒现代化，叶季允于香港及新加坡两个英国殖民地，实际体验到西方现代化工具如火车与汽船的威力，乃在《叻报》不断倡议中国应兴建火车，才能迈向现代化<sup>⑨</sup>。

<sup>①</sup> 翼满红、赵金文《丘逢甲与南洋华侨》，《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6期，第79-83页。

<sup>②</sup> 详参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第143页。

<sup>③</sup> 丘炜菱《啸虹生诗钞》，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sup>④</sup> 丘炜菱《挥麈拾遗》，第202-203页。

<sup>⑤</sup> 黄国富《在传统与现代性译之间的媒介实践：新加坡〈叻报〉的萌芽与开展（1881-1911）》，《传播研究与实践》，第155-192页。

<sup>⑥</sup> 《叻报》（第1版）1891年10月29日。

<sup>⑦</sup> 《叻报》（第1版）1903年2月25日。

<sup>⑧</sup> 《叻报》（第1版）1906年5月5日。

<sup>⑨</sup> 《叻报》（第1版）1888年7月31日；8月20日。二次刊登及倡议。

殷雪村生于福建厦门，毕业于福州英华书院，前后留学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是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是反鸦片运动的主将，也反对缠足习俗，捐助南洋华侨中学，任中华女中董事。他是西医，担任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理事，学贯中西，却十分重视中华语文的维护。他归化为英籍，效忠英国，为殖民地政府服务，却依然关心中国事务，殷雪村的例子呈现了 19 世纪新加坡华人上层阶层的真实样态<sup>①</sup>。

柯木林主编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将开埠以来的新加坡华社分为三个时期，一是 1819 年至 1945 年的“帮权时期”。华人在政治上认同中国，同中国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上形成由各帮群垄断的商业网络，以传统家族企业模式为主。二是 1945 年至 1965 年的“转型时期”。华人逐步转向认同新加坡；经济上走向内外资大重组，华侨经济既是侨民经济又是当地经济重要支柱。三是 1965 年至今的“国民时期”。认同新加坡，完成了从“华侨”向“华人”的转型。在多元的新加坡社会中，华人文化认同有其特殊性，表现为既认同马来族或他族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比如形成了融合中华文化与马来族文化的峇峇文化<sup>②</sup>。丘菽园所处时代是第一时期，其思想脉络却已呈现中西方两股思潮的交汇，可谓新加坡多元社会之萌芽。

## 结论

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政治的体制正式开启新页，推翻了自秦汉以降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以强调共和精神与价值的民主政治取而代之，自传统迈入现代的过程，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带来深刻影响。在思想层面上，传统的“家天下”、“忠君”观念，不再成为政治的主导力量，失去皇权之后，其他所依附的社会、文化等规范常轨，尤其“避名讳”制度，这是过去君主专制政治所建立的抽象及封建价值，自然被视为“守旧”的象征，理应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解体而崩溃湮灭。

<sup>①</sup> 李元瑾《比较研究：三种回应模式的定型》，《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丘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第 365-367 页。

<sup>②</sup> 详参黄惠敏〈海门奇葩——峇峇文化〉，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海峡出版社，2017 年，第 313-343 页。

然而，政体革新或名人呼吁事实上无法彻底改变一个时代的难题，如今“邱”、“丘”二姓仍并存，说明了近现代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各种形形色色的新、旧思想及价值观交错，复杂的局面。丘菽园改还本姓的事件，展现了这段时期，其思想内在变化的动力。这股动力来自于丘氏身处的，西化程度较高的殖民地环境，也间接呈现了现代性由西方向外殖民而传播到新加坡的实况。可见，我们不能把现代性理解为规范性概念，殖民者无法规范被殖民者如何走向“现代”，现代性实际是一个历史偶然的时刻与过程。因此，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脉络下，除了西化因素，还需加上维新知识阶层的涉入因素，其现代性的过程及样貌更形复杂。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完全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流寓或当地文士引导的逻辑，而是相互掺揉、协商与混合后的结果。这就是，跨域中华文化的日常实践，唯有考察它所展现的同质与异质部分，才能稍微理解域外华人社会的特性。

丘菽园身处他者文化空间，主体自身面对的是一个“自由选择”经常会被压迫的区域文化语境<sup>①</sup>，在此特殊语境下，海外华人群体却反而对于“姓氏”展现更巨大的坚持，更想凸显主体的特征，以“姓氏”作为支持中华特征及族群身分及文化的要求，这因此造成丘菽园有更强烈的维系“姓氏”（正统）的决心。丘氏因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定居地，被迫隔离于中国本土空间之外，儒家重文轻商的文化传统更深化了其向内转的自我完美理念，姓氏代表“文化中国”的历史沉淀，印刻生存主体的感觉与生存方式。因此，丘氏改还本姓的举动，揉合了其自身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文化语境、新思想与人生实践等因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

基于丘氏民国后的档案署名及生前自筑生圻墓志铭皆已改还“丘”姓，可证其意愿，故笔者呼吁学界予以尊重，应统一以“丘”字作为菽园先生之姓氏。

责任编辑：王康玮

校 对：周佳燕

---

<sup>①</sup> C. L. LIM, *Race, Multi-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4, p.117-149.

# **On the intrinsic meaning of “Master Poet of the South” Qiu Shuyuan changing his original surname**

## **Taking the characters “qiu” and “Qiu” as examples**

**Liang Chin Chun**

Feng Ch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Qiu surname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have stemmed from the avoidance of the surname “Qiu”.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the topic from a phil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preting the origin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Qiu and Qiu. It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taboo studies and the Confucius name-avoidance incident on the characters Qiu and Qiu. Furthermore, with a focus on the life, works,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of Qiu Shuyuan,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Master Poet of the South”,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impact of Westernization on the modern context of Singapore,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such as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and Qiu Fengjia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s. It clarifies the intrinsic meaning of the Qiu surname’s restoration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idering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epitaph written by Qiu Shuyuan himself aft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consistently uses the Qiu character, the author urg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respect this choice and uniformly recognize Qiu as the surname of Shuyuan.

**Keywords:** Qiu Shuyuan, modern ideas, taboo of true names, surnames

## 矛盾与符号：

### 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私语化书写的社会属性

赵润哲\*

**摘要** 清代忆语体笔记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叙事意图的矛盾变化，探索其中士人的创伤心态与身份认同，可析得忆语体笔记文背后的符号自我还原与回忆空间建构。作者以交游、序跋社会性活动让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私语化书写属性公之于众，因而文本成为了承载疾病苦悲、仕宦彷徨人文关怀的寄托，从而建构起士人创作心态的嬗变脉络。

**关键词** 忆语体笔记文 私语化书写 符号自我 回忆空间

对于所谓“忆语体”文学，学界定义纷纭，但不外指称明清民国时期文人以笔记体书写的家庭生活回忆文学，因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为此类滥觞，延续“忆语”之名有诸如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孙道临《小螺病榻忆语》、程善之《倦云忆语》、王德钟《咒红忆语》、陈宗藩《偶然室忆语》、王韬《眉珠庵忆语》等文本，除以“忆语”为名外，亦有题目隐含回忆情感的诸如蒋坦《秋灯琐忆》、余其铨《寄心琐语》等文本，因成一脉文学样式。研究清代忆语体笔记文可从中窥见其记录私隐书写的意图矛盾，涂元济校点本《闺中忆语五种》收录其中代表性五种忆语体笔记文，据此五种进行个案分析。

---

\* 赵润哲，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明清文学研究。Email: 2698576850@qq.com

\*\* 通讯作者：李军均，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junjunli@hust.edu.cn

## 一、深情与规训：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叙事意图矛盾

论证忆语体笔记文的叙事意图矛盾之前，需要明晰其中悼亡回忆的书写意图。就忆语体笔记文源流观之，不论悼亡诗或是碑志传状悼祭文，学界多有将其称为清代忆语体笔记中悼亡书写的前身的观点<sup>①</sup>，曾巩《寄欧阳舍人书》中将墓志铭与史传类比：“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sup>②</sup>碑志传状悼祭文寄哀伤之意于传主之言行刻画，虽然载录传主昭彰生平近趋于史传类文本，但因或刻画高洁或教化后世等意图而为亲者隐，因而在碑志传状悼祭文中的女性主体多有被赋予的诸如柔顺端庄、敬奉舅姑等道德审美意义。

俞樾《孙女庆曾传》中“余谓庆曾自处室及适人，惟一顺字而已。逆来顺受，顺也；即不得已而死，亦顺其道而死也。故曰顺之一字，乃其所以死也”<sup>③</sup>，言孙女之柔顺和婉；吴兰庭《亡室方孺人施孺人合志》以“孺人性端重，不苟言笑”<sup>④</sup>述亡妻方孺人端庄沉稳；钱陈群《继室俞夫人行状》忆继室“性而静默……姑姊间共处端坐或移时，亘日无惰容”<sup>⑤</sup>。悼祭文中此类描述并不鲜见，一方面封建礼教茧房中妇女言行举止理应得宜，撰者意图塑造“温柔敦厚”的女性传主形象亦符合时人教化人伦、彰扬妇德之意。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人意图以文字留存已故亲友生前德行事迹，且悼祭文的表彰功能与后世传播价值拟合“德不孤，必有邻”的儒家伦理观念，因而文人乐意以悼祭文建构士大夫道德审美下的理想女性典范。

但在此影响下的忆语体笔记文的悼亡书写产生新变——清代忆语体笔记文虽然褒扬逝者品性，但是否目的为塑造典范女性这点有待商榷。陈宏绪于《〈影梅庵忆语〉序》中所言“念古今奇妇人女子，赋性既与人异，其起居言笑，饮食嗜好，服饰器用技艺之属必俱有以异于人。当其大节未著，既忽略而不之详察，及其轰然一

<sup>①</sup> 石晓玲《表彰与追怀：清人女性忆传文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122页。

<sup>②</sup> 【清】乾隆御定；乔继堂点校《唐宋文醇》下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862页。

<sup>③</sup> 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48页。

<sup>④</sup> 【清】吴兰庭《青石诗文存·亡室方孺人施孺人合志》，《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8页。

<sup>⑤</sup> 【清】钱陈群《继室俞夫人行状》，《香树斋文集续钞》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9册，北京出版社，第325页。

旦，但以节烈一二语竟其平生。遂使古今奇妇人女子行迹，千百人如一人，若抄录旧文”<sup>①</sup>，指出妇女形象的书写困境。而本文所论及的五本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叙述主体多是饱受世间沧桑的风流才子，且笔记的创作环境都在江南社会风气开放地区，在碑志传状悼祭文影响下的清代忆语体笔记文虽有意褒扬女性亲友，但与传统的撰者塑造道德偶像之路上产生矛盾背离，这也是叙述者凝视他人聚焦流变的过程。从被视为忆语体笔记文滥觞的《影梅庵忆语》到满清鼎革之后的《寄心琐语》，其间三百余年时间里作者的他者凝视亦有生发变化。

冒襄于《影梅庵忆语》开篇便言：“爰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缘饰著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矧内屋深屏，贮光闾彩，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谱，神女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啖名之恶习已。”<sup>②</sup>因而对前文所论道德典范女性形象传统直言批驳。其言外亦于《影梅庵忆语》中深情追忆亡妾董白，以凄美哀艳的文字叙述其从相识到纳妾再到病重的过程，二人日常生活亦是笔墨重点，既有红袖添香之雅趣，亦有相濡以沫之陪伴，因而董小宛与所谓“节烈一二语竟其平生”之人霄壤之别，其鲜活多姿之态跃然纸上，亦可谓女性形象刻画一大突破。但是否确然如此情深有待商榷。《影梅庵忆语》中言及几处细节如“……舟中人宣瓷大白盂，盛樱珠数斤，共啖之，不辨其为樱为唇也”<sup>③</sup>、“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梦魂俱适。……非姬细心秀致，不能领略到此”<sup>④</sup>，此处董小宛已然被凝视物化为一种香艳符号，承载与之类比的樱桃与香料等审美赏玩性质的意象功能，叙述者的叙述意图亦跃然纸上。正如李桂奎先生所言：“女性的形体相貌修辞往往从男性的视觉和味觉的‘可观’、‘可餐’中反射出来，她们仿佛只活在男性的目光中才拥有生存的意义。”<sup>⑤</sup>樱桃与唇珠、香料与肌肤等等此类让董小宛作为男性想象力凝视的他者，这与前文作为道德偶像存在的典范女性在男性霸权话语中并

①【清】冒襄、余十眉著《影梅庵忆语》，中国书店，2019年，第5页。

②【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岳麓书社，1991年，第1页。

③【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9页。

④【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14页。

⑤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21页。

无实质区别，本质依旧是被书写物化的对象，因而叙述者情理之悖谬可见一斑。

除原文外，时人批注亦有此言，杜茶村曰：“闺秀较书鉴赏，唐有薛涛，宋有李易安。涛风尘老丑，易安失身匪人。终为风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见芳贞。而真嗜殊好，本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看似盛赞董白才思敏捷高于薛涛、易安，却因“涛风尘老丑，易安失身匪人”而否定二者的成就，本就是男性大传统下对女性物化凝视的体现。另一方面，冒襄对其他可供狎昵之女亦为此感“时正在毗陵，闻音，如石去心，因便过吴门谢陈姬。……至则十日前复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先，吴门有昵之者，集千人哗动劫之。势家复为大言挟诈，又不惜数千金为贿。地方恐贻伊戚，劫出复纳入”<sup>①</sup>。陈姬即陈圆圆，冒襄因其为他人所纳而怅惘无极，认为自己有负一痴心女子，而其所谓“劫”“贿”“纳”无一不暗含陈姬亦流为金银可易之赏玩物件。且据汤漱玉《玉台画史》引《画征续录》：“蔡含，字女萝，吴县人，如皋冒辟疆姬也。生而胎素，性慧顺，好画，兼善山水花草禽鱼，长于临摹。……辟疆姬人，又有金晓珠，名明，昆山人。居染香阁，亦善画。曾临高房山小幅，得其气韵。时称冒氏两画史。”<sup>②</sup>考证冒襄《同人集》卷三，蔡姬、金姬皆为董白去世之后所纳妾室，影梅庵之深情愧疚已然无存。因而叙述者深情悼念爱妾生平，虽活泼灵动有意与前人道德审美规范相抵，但其情理悖谬使叙述意图陷入另一重物化凝视中。

沈复《浮生六记》为《影梅庵忆语》后又一忆语体代表，其中所述妻子陈芸较之董姬亦有新变。学者文载道在《读浮生六记》中说：“书中陈芸的言行令人倾倒，无论在人格、学问、胸襟方面都非泛泛一般的女流可比，自然，要是这种女性生在此刻的话，或者还并不值得我们笔舌的评衡，但想到她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怎样的顽固腐旧，而她却往往有过人的行动，卓绝的识见，就自然令人起着敬爱之心了。”<sup>③</sup>诚然，《浮生六记》中陈芸才思敏捷、能文善绣，婚后二人交游唱和，其个性又因丈夫珍爱而更加舒展，如女扮男装游赏庙宇、公开表现二人之亲善等等，都与中国古代理学对妇女德行要求的现实所抵触，与“温柔敦厚”道德规训去之更远，不可不

<sup>①</sup>【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13页。

<sup>②</sup>罗世平主编；崔元和、李福顺副主编《玉台画史·玉台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2页。

<sup>③</sup>文载道《读浮生六记》，《古今》1943年第36期，第16-20页。



言为一种个性自觉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并非二人惊世骇俗之行迹，清中期沈复所处之江南地区夫妻艺术唱和并不鲜见，如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所载：“印白兰，字幽谷，江苏嘉定人，布衣李宝函室。宝函怀才不偶，市隐虎邱，仿濮仲谦作雕竹器，幽谷荆布相庄，老而无子，日以吟咏为乐。”<sup>①</sup>袁枚有“吾乡吴小谷明府之女柔之，适狄小同居士；绍兴潘石舟刺史之女素心，适汪润之解元；皆彼此唱和，如笙磬之调”<sup>②</sup>。又如吴藁登科前继室孙氏以诗寄意，因而当时有言：“微云夫婿，柳絮才媛，艳句流传，亦可谓倡随佳话矣。”<sup>③</sup>由此可见，沈陈二人唱和游赏亦可溯其时代现实土壤，江南士子的浪漫才情与道德规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平衡。二人按理应白头偕老，但因陈芸屡次失欢于公婆，二人被大家庭放逐，后陈芸因血疾兼贫困无依而逝。可见叙述者纵与家庭决裂，亦难以跳脱封建大家庭的桎梏，自身感情与家族孝义难以两全，其笔下性灵女性成为社会倾轧下的悲剧。文人理想与现实反射当时女性话语之困境，虽与董姬之于冒氏赏玩凝视性质截然不同，其笔下书写陈芸之性灵狡黠又因社会家庭茧房所塑妻性而陷入矛盾。

《香畹楼忆语》作者极力书写自己对紫姬之深情，马履泰于原序中言：“昔琴牧子谓非董宛君之奇女，不足以匹冒辟疆之奇男；今以余观孟楷、紫湘之事，遇奇而法，事正而葩，郑重分明，风概既远轶冒董，即就《香畹楼忆语》与《梦玉词》笔墨而论，尤非雉皋所及。”<sup>④</sup>若将其与冒董相论，紫姬较董白获得丈夫更多真情。《影梅庵忆语》多记述董姬对冒氏饮食服侍之言行，且冒氏逃难时多有遗弃之意：“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维时更无能手援姬。”<sup>⑤</sup>董姬一人其后追逐冒氏车驾。而紫姬并未困于婢妾嫡庶之分，为丈夫官场犹疑分析辅佐，陈裴之赞其“怡词巽语，时得韦弦之助”<sup>⑥</sup>，得到夫妻更平等的爱。较陈芸与封建大家庭决裂而言，紫姬亦赢得陈氏满门的尊重，除生前关怀外，身后陈家满门乃至公婆皆有哀悼祭谏，以至于有“过情”、“逾礼”之讥。虽较董姬与陈芸而言紫姬已然幸运，主人公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消散后，

<sup>①</sup>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五，上海书店，1987年，第303页。

<sup>②</sup>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69页。

<sup>③</sup>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91页。

<sup>④</sup> 【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66-267页。

<sup>⑤</sup> 【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0页。

<sup>⑥</sup> 【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34页。

其亦难逃社会层面的礼教伦理悲剧，紫姬因紫星替月早逝，作者“肠回目极，心酸泪枯”<sup>①</sup>。《香畹楼忆语》其中为叙述者代言的塑造紫姬形象隐含作者之愧疚无奈，亦是对传统礼教的弱声反叛，但现实仍以牺牲紫湘维系传统，其隐语书写与现实悲谬之互异是个体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

《秋灯琐忆》、《寄心琐语》与前文所论“忆语体”笔记结构大略相似，皆先言定情缘起后叙述伉俪情深、夫妻和睦。如《秋灯琐忆》中蒋坦着墨新婚之夜二人对诗直至“……檐月暖斜，邻钟徐动，户外小鬟已啁啾来促晓妆矣”<sup>②</sup>；夫妻秋日唱和诗句“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sup>③</sup>，以及秋芙次韵“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sup>④</sup>；夜间为妻子温莲子汤“分案上灯置茶灶间，温莲子汤一瓯饮之”<sup>⑤</sup>等等，看似同前文所论及“忆语体”笔记皆为叙述者塑造妇才德行、琴瑟之好的形象书写，但《秋灯琐忆》中“今去结缔又复十年，余与秋芙皆鬓有霜色”<sup>⑥</sup>及后文可知该篇为夫妻十年婚后纪念之作。学界对《秋灯琐忆》是否为悼亡之作存在争议，因其叙述结构既有二人生活现实纪录，亦有对秋芙悼念之语。李汇群先生《〈秋灯琐忆〉新考》<sup>⑦</sup>认为，《秋灯琐忆》是由蒋坦写于不同时期的片段所拼接集成的。不管如何，《秋灯琐忆》未似前人于斯人逝世后追悔痛惜，而是具有纪念生活意义的文字记录。且作者叙述意图中对秋芙报以尊重平等，如“不意秋芙亦能作议论，大奇”<sup>⑧</sup>，真心赞赏倾听妻子与其相左的观点等。因此在“忆语体”笔记的程序上蒋坦不仅感情更深厚于前三者，其叙事意图亦并未与现实相左，因而前文言之悖谬矛盾较之隐没。

《寄心琐语》更是如此，在笔者日常寄意中蕴含对妻子之爱，且余其铎与南社友人集龚诗中独有怀念亡妻二十首<sup>⑨</sup>，在以感怀为主的南社集龚诗中别具一格。看似余十眉依旧只是将妻子描述为“事舅姑，能服劳承旨，必恭必飭”的贤妻良母，在友人姚光《书胡淑

①【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46页。

②【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91页。

③【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302页。

④【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302页。

⑤【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96页。

⑥【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300页。

⑦李汇群《〈秋灯琐忆〉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第47-48页。

⑧【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300页。

⑨曹辛华、钟振振主编；何宏玲、孙会芳整理《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第32册，《南社诗选》，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

娟女士事》中亦明确把胡淑娟称为女教的典范，以反对当时男女平等带来的女德不修<sup>①</sup>。《寄心琐语》依旧难以抵抗封建大传统对女性的凝视，但胡淑娟并非隐没在家庭背后的女性，而是与余十眉共同并肩的夫妇。友人王德钟载胡淑娟：“余君笈注灵芬馆诗集，女士（胡淑娟）助之甚力。”<sup>②</sup>因而胡淑娟在一定程度上与作为女校教师的余十眉<sup>③</sup>是平等互重的，因而与前人之忆语体笔记文相较已然矛盾消解甚多。

## 二、凝视与索因：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的士人创伤记忆

前文论述可知，从《影梅庵忆语》到《寄心琐语》期间不过二百余年时间，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叙事意图与现实之间的背离，从叙事情感与凝视话语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被追忆者书写与家族社会、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再到叙事意图与现实差异之反向逐渐消隐，这种时代变迁下的话语凝视及道德规训的迁变可从文本中的意象生发背景索因。

文本中最直观的是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有极多的疾病意象，作者人生走向或多或少都有疾病干预，而本文论及五篇忆语体笔记的作者大都早年家境富足，后经历人生不测变故，其笔记书写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士人的创伤心态与伤痕记忆，而此时的文学创作已然成了或建构回忆乌托邦、或寻求身份认同、或炫耀往日荣光的疗愈工具，以此在心灵功能中建构不同回忆空间，因而对意图与现实之间矛盾动因作出析解。

首先，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书写意图与对往日光鲜生活炫耀难分。以《影梅庵忆语》为例，冒襄年少早慧，才气纵横，“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sup>④</sup>已声名斐然，后因入复社抗清而被捕入狱，《影梅庵忆语》载：“乙酉流寓盐官，五月复值崩陷。”<sup>⑤</sup>即其后又

<sup>①</sup> 姚光在赞胡淑娟“为女、为妇、为妻之道”前认为当时“女教之不修也，盖久矣。近世号兴女学，而见解多误。自自由之说倡，而夫妇之道反苦。平等之义起，而家庭之情以离”。【清】冒襄、余十眉著《影梅庵忆语》，第210页。

<sup>②</sup> 挹芬女史《名闺奇媛集序》，交通图书馆，1922年，第44页。

<sup>③</sup> “毕业后，历任上海南洋女校、爱国女校、竞雄女校、省立嘉兴中学，及嘉善县县立高小、陶庄小学等校教职，1954年在嘉兴中学退休。”见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善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052页。

<sup>④</sup> 【清】赵尔巽《清史稿》第45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51页。

<sup>⑤</sup> 【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1页。

因战乱举家流亡，因其于动乱之际保全自身而深受“谗口铄金，太行千盘”<sup>①</sup>所累，以致“久拖奇疾，血下数斗，肠胃中积如石之块以千计”<sup>②</sup>。在此等苍惶无依、众叛亲离的窘境下，可以说身体病痛之精神病因与他人谗诬、国家动荡无法分割，山河破碎亦为明末士子留下疾病伤痕，以致入清亦无法痊愈。正如童庆炳先生于《现代心理美学》所言：“艺术家各种早期经验都随日后经验而改变或塑造，其结果是出现了不同于实际经历、感受的对整个人生、社会更深刻的体验。”<sup>③</sup>诚然，归隐山林后，曾经流亡的精神伤痕让冒襄追忆往日岁月，《影梅庵忆语》中对往昔风月的回忆不乏为对现实隐痛的炫耀掩饰。《同人集》卷十《寒碧堂赠诗》收有邓孝威自跋：“此非昔日豪门朱栏，美人才子，植板喧闻，歌舞骄集之地，而今一旦至此乎。”<sup>④</sup>对冒氏园林评价可见一斑，当面临生死关头冒辟疆则“与姬决”<sup>⑤</sup>，冒氏并非无情，但家国两难、性命攸关之际，所谓情深亦可抛却，且从前文论述冒氏书写中二人情理悖谬与物化凝视可见，当时江南名妓配名士的风俗令其书写更增特殊文化声望，董姬之于冒襄不过是“知识戏耍的对象”<sup>⑥</sup>，因而此时隐居山林生活粗简的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深情回忆爱妾董小宛的创作态度不乏有炫耀往昔岁月荣光的意味，往日光鲜亦成其掩饰现实伤痕的贴剂。

其二，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书写亦有建构回忆乌托邦之目的。维拉·波兰特对于探讨创作与疾病的交流功指出：“不仅使艺术家能表现痛苦，而且承受着痛苦。”<sup>⑦</sup>艺术本身成了作家逃避现实苦难境遇的传声筒与栖息地，而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作为一种经验书写的疾病事件，泛而象征其现实不幸遭际，勾连起“个人—疾病—社会”三角形，并支撑起单纯美好的回忆空间以麻醉神经，在此基础上个人功能的失灵与社会伦理的失范都得到疗救。

以《浮生六记》为例，作者沈复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sup>⑧</sup>形容自己早年出身，且从其所述之花园、婢仆等可窥富足生

①【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3页。

②【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4页。

③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④【清】冒襄《同人集》卷十，第1882页。

⑤【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1页。

⑥毛文芳《物·性别·观看》，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377页。

⑦【德】维拉·波兰特著；方维贵译《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第125-133页。

⑧【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67页。

活，又因“非淑姊不娶”<sup>①</sup>与心上人陈芸成婚，不可谓不顺遂。后因家中负债移东补西，左支右绌以致“不数年而逋负日增”。又因误会与家族决裂，陈芸常带病刺绣贴补家用，因其誓不医药且弱者骤劳而血疾病逝，自己亦疾病颠连。沈复与陈芸因社会家族的冷漠排斥而屡受打击，“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sup>②</sup>。在建构美好回忆世界同时隐含现实悲伤的谶语，因而《浮生六记》中追忆美好往事亦有建构疗愈机制以自我麻醉之意，正如沈复在陈芸死后接受石韞玉所赠妾室而言“重入春梦”<sup>③</sup>，此“春梦”亦为此乌托邦的现实选择。

除此之外，冒氏于《影梅庵忆语》长叹“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sup>④</sup>。陈裴之自紫姬病逝之后仍下榻碧梧庭院，以文字“梦姬笑语如平时”<sup>⑤</sup>追忆曾经欢愉等。由上可知，在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士人创伤心态无可避免投射文本，作者以叙事与描述疗救心灵、淡化伤痕，文学成为愈合伤痕慰藉心灵的良药。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因此，在描述与叙事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在深层次上具有所有乌托邦话语特色的张力。”<sup>⑥</sup>詹姆逊还将乌托邦文本与现实苦难联系：“如果人们想要回避对苦难的考虑，他们也必须同时回避对乌托邦文本的考虑，因为乌托邦文本必然在其自身内部包含着对苦难的表达，以便构成对消灭苦难的愿望的实现。”<sup>⑦</sup>忆语体笔记文建构了心灵对话式的乌托邦结构，是与苦痛现实存在理想鸿沟的心灵花园，亦是对不安现实的隐喻反映，作者无力解决现实困境因而用文本自我麻醉，对往日幸福生活的追忆包含消除病痛的种种设想，因而其书写意图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异生发张力。

其三，清代忆语体笔记文隐含身份认同的追寻。美国符号学家威利在其《符号自我》一书中提出“符号自我”的定义，即“自我是一个符号……而是指一种文化的性质”<sup>⑧</sup>，在人类与社会的对话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身份符号集合，而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作者建立

①【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68页。

②【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74页。

③【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112页。

④【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14页。

⑤【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45页。

⑥【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与叙事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⑦【美】詹姆逊著；王逢振译《时间的种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⑧【美】威利《当代符号学译丛——符号自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页。

重情重义的符号身份，追寻大传统观念上对其人格道德的肯定。中国古代早有“诗缘情”的传统，发展到明清时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sup>①</sup>的至情论，忆语体笔记文虽非诗歌戏曲，但亦处于此语境下。如冒氏因“桀犬群吠，众口谣诼”<sup>②</sup>饱受流言困扰，而对董小宛之情深却为人所称道，李明睿称《影梅庵忆语》为“绝不作一媚语、软语、昵语、私语”<sup>③</sup>，综其始末，大都结撰于文心侠骨，而一种幽香静味，即铁石人见之，亦当下泪”可见其赞誉；余十眉不仅在《寄心琐语》中怀念亡妻，其与南社的集龚诗中亦作二十首悼亡诗，其深情友人皆知，王德钟说“胡女士之殉也，夫子余十眉哭之恸”<sup>④</sup>，更得其友人所重等等。因此，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重情的道德追寻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作者对社会身份认同的诉求。

### 三、伤痕与心理矛盾下的符号自我与回忆空间建构

由前文论证的清代五本忆语体笔记文矛盾生发与隐含原因，可见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中作者虽建构起不同的叙事空间，但其书写意图与读者接受之差异规律有迹可循。

不同于中国古代诗词“男子作闺音”的弱德隐喻<sup>⑤</sup>，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以两性情感为表现中心的书写更为深情真挚，正如已有学者总结其抒情范式为亲历私语的真实性、始末周全的完整性、爱恋悔恨的多元性<sup>⑥</sup>，其情感因私语化书写而于文学史别具一格。文学史上不乏爱欲叙事书写，从宋元话本到晚明狎昵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其间爱欲叙事并不鲜见，正如李贽所言：“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sup>⑦</sup>而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以其个人视角亲历其情更为真挚，隐私

①【明】汤显祖《汤显祖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03页。

②胡晓明、沈喜阳《江南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3页。

③此处所谓“私语”与所引“媚语、软语、昵语”及整句表达意义相较，指倾向于私隐淫靡的私生活书写，李明睿所言是指作者悼念一腔真情而未带香艳。本文所述“私语化”是指对个人隐私生活的自述记录，并不强调香艳内涵，如冒氏所言“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因而并不相抵。

④吴定中《董小宛汇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⑤叶嘉莹《从文学体式与性别文化谈词体的弱德之美》，《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第100-106页。

⑥李芬兰《“此情可待成追忆”——论清代“忆语体”散文的抒情范式》，《名作欣赏》2015年第494卷第6期，第107-108、110页。

⑦张凡编注《李贽散文选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

内容书写亦典雅含情，如冒辟疆于《影梅庵忆语》针对他人对其私人情史的香艳调笑所言：“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sup>①</sup>坦言自己一腔真情寄寓文字，由此可见忆语体笔记文虽与前人道德书写传统相悖，但记录夫妻情事时并未流于红绿香艳。

而文本中对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书写则将此类私语回忆抒情置于所处时代的大环境中，正如前文从文本中疾病事件索知作者书写意图与现实选择之差的部分原因，清代忆语体笔记文因而建构起自身回忆空间以疗慰或镇痛。对于“回忆空间”内涵可以阿斯曼夫妇研究内容为释，所谓“回忆”较于“记忆”而言，“记忆”倾向于对具体时间的复现，而“回忆”则是在对事件朦胧印象上经由作者情感选择的二次加工。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sup>②</sup>此即记忆是短时性的个体印象，回忆则是历时性的群体认同。在历史长河的倾轧下，社会时间将士人群体的记忆压缩为以文本为媒介承载文化认同与文化延续的谱系，由论文前两部分论述可知，以本文论及的五篇日记文为代表的清代忆语体笔记文意图矛盾虽有所不同，但矛盾生发规律有迹可循。清代士人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时间素材投射入忆语体笔记文中，其间不仅承载作者个人的追忆与隐思，亦凝聚清代士人政治追求与心灵属性。在这个谱系中以疾病、苦难交织建构出的个人空间难以逃脱时代文化的影响烙印，私语书写与社会属性的背离与重合由此拉扯出张力与内涵。

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作者原初书写意图是悼念爱侣，如《寄心琐语》中余十眉痛悼娟君而作此：“杂纪其生前琐事，倘亦吾娟君之所愿言，墨耶？泪耶？君其见耶？”《香畹楼忆语》亦悼念紫姬：“呜呼紫姬！魂其慰而，而今而后，余其无作可也。”<sup>③</sup>《影梅庵忆语》“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与偕姬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虽有吞鸟梦花之心手，莫能追述”<sup>④</sup>亦然如是，即出发点是悼念情人的私语书写。兼而从其细节叙事阐发亦可观之，如《秋灯琐忆》述秋芙“绾堕马髻，衣红绡之衣，灯花影中，欢笑弥畅”<sup>⑤</sup>，此为二人床

<sup>①</sup>【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页。

<sup>②</sup>【美】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2、201、87页。

<sup>③</sup>【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50页。

<sup>④</sup>【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页。

<sup>⑤</sup>【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91页。

第间趣事；《闺房记乐》中“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sup>①</sup>，记叙二人洞房花烛之细节；《香畹楼忆语》中详细记录紫姬护理长甲“姬……指爪皆长数寸……必以金驱护之”<sup>②</sup>等，可见忆语体笔记文中对爱侣私隐生活的书写。因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传统对妇德的申定与束缚，明代女训继宋元后进一步加强贞节观念，如吕坤《闺范》所言：“丈夫事业在六合，苟非婧伦，小节犹足自赎，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sup>③</sup>由此见其在夫妻一体观念下对于女性身体训教的严苛。在此类教化约束茧房下，关于后宅妇女私人生活书写因维护名节而不会出版宣传，因而原初私人化书写的悼念意图与作者期待相契合。

而在对清代忆语体笔记文的读者接受未能如其期待，在忆语体笔记文的生发时代就不乏对此评价比较之语，如王德钟《寄心琐语》跋言：“已自巢民为影梅庵忆语，后世悼亡，有作辄援其例而工者至鲜。以予所见陈小云《香畹楼忆语》、沈三白《闺房记乐》以外诸检下而已。……《香畹楼忆语》惊才绝艳而微欠神韵，《闺房记乐》笔曲而达能言人所不能言，而时累伙巧。是丽不待言，玉烟珠泪能于疏宕中见情致者，虽才气略逊水绘，要亦艺苑之精品也。”<sup>④</sup>作者原初书写意图，即私隐叙事的个人记述被打破，时人阅读以填补作者所留下的叙事与情感空白并与他者文章比较，抑或进行价值与道德判断，这与作者所期待的私语化写作视野并未一致。

在此现象上可探究作者原初书写意图与时人阅读接受状貌之间轨道偏异之因，其与作者邀请亲友题序难以离分。如有《浮生六记》原名《红尘忆语》之说，好友管贻葑于题跋言其取名渊源“浮生六记，取名浮生者，系本脂评石头记所作‘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之诗意而定名”<sup>⑤</sup>，可佐作者与好友交游题跋之事；又如陈焯于《影梅庵忆语题词》记述“今年春，冒子辟疆驰其新刻数种见寄，中一题曰《影梅庵忆语》，纪其亡姬董小宛事至四十条……”<sup>⑥</sup>可见冒襄将《影梅庵忆语》已示好友；在《嘉善文史》对余十眉之子余湘的采访中，余湘称《寄心琐语》“于民国七年

①【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70页。

②【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242页。

③吕新吾《闺范》，《蒙养书集成》第2册，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94页。

④【清】冒襄、余十眉著《影梅庵忆语》，第176页。

⑤刻本原署名“管贻萼”，俞平伯考证其勘误应为“管贻葑”，《俞平伯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86页。

⑥陈焯《影梅庵忆语题词》，冒广生辑《如皋冒氏丛书》第15册，光绪至民国刻本，第48页。



(1918)由上海国光书局承印,可惜只印了四五百本,作为分赠亲朋好友的纪念品”<sup>①</sup>,可见其文本交游功能。

序跋满足热奈特对“副文本”的定义,弗兰克·埃尔拉夫对此做出解释:“副文本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sup>②</sup>相比于图画、封面而言,序跋这种在正文文本前后指涉内容的文字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解释都有引导阅读的功能。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是“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变化的)氛围”<sup>③</sup>,在忆语体笔记文这种私语化书写中,作者邀请亲友题序可为沟通私语书写与社会接受的桥梁,序跋作为隐含社交功能的副文本承载社交功能,勾连起个人私语与社会属性的联系,此时作者的最初创作意图很可能会向带有社会认同的话语书写而倾斜。

清代忆语体笔记文原初私语化书写意图与社会阅读反映因题序交游而互通映带,作者因而以此纽带以全其隐含意图,正如前文所论及的忆语体笔记文作为或建构回忆乌托邦、或寻求身份认同、或炫耀往日荣光的疗愈工具则更有佐证,在此基础上可探究清代士子个人与社会的离与合。

本文所论及五篇忆语体笔记文,爬梳所处时代语境可寻根心灵动荡。冒辟疆与张岱均处于明末清初,其遗民心态可见一斑。冒辟疆在暮年写给友人谭籍的信中如是说:“所遭极六合内外,一部世一史未有,盲风恶浪,百忍蒙头。正七十时,火焚刀接,又过七年,今贫、病、老并臻三绝,犹然豁达慷慨,灯下写蝇头字数十,搜读未见书,与宾客浩歌剧谈不倦,空诸所有,儿孙不恤也。”<sup>④</sup>而前文论述其文字中有明清鼎革之载。而陈裴之与蒋坦,生活于清代中期,王朝安稳,战乱多为王朝内部动乱如太平军起义等,其笔记中记叙夫妇生活琐事之余流露出人生幻梦与物是人非的苍凉无奈,“忽忽前尘,如梦如醉”<sup>⑤</sup>之语则如是,疾病、仕宦等因素难以忽视,历史大背景追忆则较为淡薄。而余其铤则较之多有民族时代情绪,其与柳亚子等南社诸人集龚句多有记载,姚鹓雏《南社琐记》

<sup>①</sup> 《百年南社的最后一抹余辉》,转引自杨越岷辑《那人,那事,那个地方》,团结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sup>②</sup> 【法】弗兰克·埃尔拉夫《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sup>③</sup> 【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sup>④</sup> 【清】冒辟疆著辑;万久富、丁富生主编《冒辟疆全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010页。

<sup>⑤</sup> 【清】冒襄、沈复等编《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第300页。

中言其集龚诗作：“由燕赵慷慨激烈之音，转为雄奇瑰异，虽跌宕文酒，寄情山水，无不寓其感伤家国之意，故其音韵气节，自然近于龚羽琤。”<sup>①</sup>因而正如一些学者所论，余其铨虽以集龚表达个人哀思，但亦有南社人喜爱龚诗的家国救亡之因。

正如美国符号学者威利提出的“符号自我”理论，并在其论述的三元模式中证明符号自我的向上还原所言<sup>②</sup>，本文所论及忆语体笔记文内容看似是个人私语化回忆书写，实则是对清代士人心灵世界的构建，亦即是清代士人心灵史的记录。威利所言及“符号自我”是文本中隐含作者在与他人、社会的符号性交流中构筑的动态身份符号，可以是多个身份的集合，“自我是一个符号实体。这并非不意味着自我运用着各种符号，还意味着自我本身是一种符号”<sup>③</sup>。而清代士子通过忆语体笔记文向现实或未来构建其身份符号，其叙述中隐含流露出的现实抉择动因、身份认同的追寻与躲避苦难的救赎等都在建构起作者隐含指向的符号身份。而在作者私交或广泛的交流品评中，隐含的身份符号随着向社会集体的交流动态靠拢，向上还原并融入为集体无意识的规训与包容，其自反性也使大传统的礼教社会更好容纳现实作者。

清代士子忆语体笔记文中构建的或情真意切、或忧心家国、或闲情寄意的身份符号与其所处时代息息相关，作者在以题序、作跋为介质的较小范围交流中与大时代文化对话，在将日记文展示友人后，这种的公共性表达方式意味着作者的符号建构是流通与开放的，因而士人的忆语文字更多的是清代士子心灵史的建构，其文字间矛盾逐渐消解的过程亦是士人与清代社会矛盾不断消解的过程，从封建鼎革到王朝稳定，再到举国救亡，清代士人与社会矛盾的重心也在不断改变，其间忆语体文字是士人与社会背离与求和中符号塑造的载体，亦是承载疾病苦悲、仕宦彷徨人文关怀的寄托。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的五篇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作为回忆旧日爱侣的笔记体散文存在作者意图与文本书写之间的矛盾嬗变，在悼念妻妾、表达哀思的同时，隐含作者建构回忆乌托邦、寻求身份认同、炫耀往日荣光的写作意图。通过与清代时代环境和作者人生经历相结合，作者在其中建构身份意识的符号自我和回忆空间，在这

<sup>①</sup> 姚鹓雏《南社琐记》，《姚鹓雏文集·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77页。

<sup>②</sup> “三元模式”即“当下——主我——符号”直接向“未来——你——解释项”对话，并间接解释“过去——自我——客体”的动态过程，【美】威利《当代符号学译丛——符号自我》，第167页。

<sup>③</sup> 【美】威利《当代符号学译丛——符号自我》，第5页。

个层面上，清代忆语体笔记文不仅是士人身份意识的向上还原，更是清代士子心灵史的书写，在旧梦依稀中寄托了清代士子在疾病苦难、人生浮沉的人文关怀。

责任编辑：陈妤佳

校    对：梁心嫣



## **Contradiction and symbol:**

###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private writing in the memory style diary article of Qing Dynasty**

**Runzhe Zha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tradictory changes in narrative inten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s retrospective diary writings. This analysis uncovers the symbolic self-disclosure and the creation of memory spaces in memoir-style notes. The author brings the private and introspective nature of Qing Dynasty memoir-style notes into the public domain through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s socialising and writing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Consequently, these texts become a vessel for expressing the sufferings of illness, the uncertainties of officialdom, and the humanistic concerns, constructing the evolving trajectory of the literati's creative mentality.

**Keywords:** The memory style diary article, Privacy writing, Symbolic self, Memory space